

丁 山 著

#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大中國圖書局發行

丁山著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大中國圖書局發行

## 序

人類社會的發展受着生產力的限制，生產力的發展又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所發生的影響，不言而喻，是如何的鉅大。但是，被地理環境決定的生產力，有時壓迫人類過甚，反可以使人們殫精竭慮，增加其控制自然的能力，改變了周圍環境而與之發生一種新的關係，因此，從社會發展史看，這種影響的成就會得隨時改變，後期的面目決不就是初期面目的延續。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環境，也即是都有其特殊的環境下造成的歷史，所以我們在研究各個民族的歷史的時候，不該不密切注意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的特殊差別，概括地說來，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高寒之區，一大片的高山和一望無際的沙漠相間着，終年不見雨水，一天裏的氣候好像四季般轉變，土地瘠薄，沒有農業的價值；間或碰到些積水的湖沼，涓細的河流，和點綴在水裏的綠洲，也只該供畜牧。生活在這裏的人民不得不把馬牛羊等牲畜當作唯一的財產，他們追逐水草，馬上為家，飄忽不定，因此就養成了健強的體格和雄偉的氣魄。他們利用了敏捷而茁壯的馬匹不時向溫帶的居民作經濟上的掠奪，給人類文明以極大的威脅。第二類是巨川洪流灌溉的平原區域，土地肥沃，四時有

定序，農業興盛，造成了農業社會的燦爛文化。生長在這塊的，有豐富的食糧，無遠遊的需要，就養成了『安土重遷』的性格。至於第三類呢，那是跟海洋相連的海岸區域。那邊的居民受了海洋的陶冶，很容易產生一種廣大的空間觀念和勇敢的進取精神，做遙遠文化的溝通使者。

如果照這樣區分，那麼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便是第二類型——黃河流域。由於這流域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第一類型——高寒區域，所以跟北方游牧種族的關係也就特別嚴緊。我們民族的歷史，除了近世以外，可以說是——一部生長在這兩個類型裏的人民長期鬥爭而逐漸融合為一個民族的歷史。因此，在從事中國史的研究上，對漢族和塞外諸族的相互鬥爭和相互融合的過程作有系統的研究，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事情這般重要，而學者們對於這個問題作系統研究的直到現在還是絕少，這無疑是學術界中一個缺憾。頤剛以前在北平編輯禹貢半月刊，就想致力於民族史的研究，同志討論的也日多，不幸倭禍突來，到今不能繼續，想着就心痛。

丁山先生久有志於全部中國歷史的整理，孜孜不倦地理頭工作，寫了很多的稿子。現在他就講習之便，寫出這本短小精悍的著作——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是他中國通史的第一章，也是系統地研究中國民族史的第一篇大文章，雖篇幅無幾，而單刀直入，抉出中國歷史的中心問題，儼然是一部通史的骨幹，這是值得我們鄭重介紹的。

這部書的重要貢獻大約有三點：

第一，他利用了充分的史料，出以生動的筆法，依了山川形勢的概況，地理環境對於風俗習尚的影響，來敘述我國初期歷史的各個部族；又說明了秦始皇滅了東方諸雄，用「車同軌，書同文」的政策克服了地理上的障礙和五方殊語，別國方言，融合無數不同的種姓於一爐，奠定了中華民族萬世統一的基礎。這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真確的輪廓。

第二，他指出動力的差別即是強弱成敗的差別，游牧種族所以能壓倒農業種族，即因他們的馬的動力勝過了中原的牛的動力，黃河流域常受塞外馬蹄的蹂躪，可以說是一件命定的事。趙燕秦諸國爲求控制自然，謁了人力來造萬里長城，似乎可以擋住塞外馬蹄了，可是他又指出，要解除這種威脅不能專靠長城，必需先求自身政治的清明，然後可以萬眾一心，用了馬的動力來制服對方馬的動力，歷史上漢武帝和唐太宗的盛世就是這樣造成功的。即此可知這本書雖注重地理環境，却不是「唯地史觀」。

第三，他指出，歷史上南北長期對峙的分裂局面，三國之外，前如南北朝，後如宋遼金元，總是受地理環境的支配。苻堅的兵臨肥水，金兀朮的飲馬長江，所以不免慘敗而還，都因爲「北馬」征服不了「南船」。但是，他又指出，倘使一國的內政腐敗，那麼，雖有天塹之險仍

救不了滅亡之難，南朝的陳和南唐南宋的亡國都可取作鑑戒。所以，他說，我們中華民族所處的地位雖甚優越，決不該以此自恃；尤其在今天，人類的生產力儘足征服地理障礙的時代，我們更應當消除黨派之爭，和衷共濟，迎頭趕上世界各工業先進國，消極地防禦野心的侵略者，積極地負起保衛世界和平的責任。這是多麼腕舉的一個指示！

總之，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種族間的相互侵略本是逃不了的一個階段。同時，一個種族的社會的衝突可以招來外族的入侵；同樣地，外族的侵略也會使一個種族的社會內部的衝突愈加尖銳化。但是，這種發展的過程却也正可促進各種族融合而成爲一個民族，在中國，由於漢族所處地理位置的關係，跟塞外諸種族的戰事特別多，而即由於這種關係，我們的文化和經濟才會不斷的南移，並進而使我們民族不斷有新血輪的滲入。今日，世界諸文明古國都已滅亡，而我們民族所建的國家巍然獨存，各種族的不斷融合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丁先生這部著作，根據了歷史事實給予這種關係以有力的說明，這是我們最感謝的。

希望丁先生繼續這番功績而寫成一部偉大的中國通史，同時希望民族史的研究者和通史的作者都能接受丁先生的銳利的觀察和豐美的貢獻！

## 引言

國力的強弱，全視生產動力的多寡。

鐵器時代以前，人類雖然知道利用自然動力，發明若干精粗的工具以改造一切資源加強已身的內容，不幸，爲工具和動力效能所限，終不能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人類的生活，總是受制於大自然。自轉入蒸汽時代，科學日新月異的進步，人類的動力獲得輪軸的轉動而加強至於無限，偉大的自然界始漸被科學所分解利用，而稍受制於人類。我們民族文化，在道家「有機械者必有機心」的反動思想支配之下，一向主張「火巧不可爲」，舉凡奇技淫巧，都要禁制其前進，甚者以「玩物喪志」爲思想之大防。由於這類傳統思想的積壓，把民族的才智都束縛在唯心論——玄學方面，我們民族的生產動力，遂長受自然界支配，文化乃長期的停頓在鐵器時代。

所謂大自然的基礎，不出天象和地理。人類如不能探尋大自然的祕密，這種祕秘的力量便來支配人類的生活。我們民族，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帝完成中華一統至於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國的傾覆，這兩千餘年間物質文明有何顯著的進化？尙待另篇討論。現在所可作簡明的敘述者，如吳貫因田賦私議所謂：

「西漢盛時，全國墾田爲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隋大業，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唐天寶，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宋元豐，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元至元，一千九百八十三萬頃。明崇禎中，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頃。清光緒，九百十六萬一千三十八頃。以上，最多者爲

隋，次則元唐，次漢明及清，而最少者宋。謂領土有廣狹耶？則元清廣過於隋，何皆不及？明不狹於隋，乃不及隋六分之一。謂戶口有多少，田因之耶？則隋大業戶僅八百餘萬，唐天寶有戶九百餘萬，數過於隋，何以田不及三分之一？元盛時，戶千餘萬，遠在隋上，乃亦不及一半？且隋盛時人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今之人口約有四萬萬，數增十倍而田竟及五分之一？……」

按，隋之盛時，國家疆土面積不過漢唐；戶口也不過與漢唐相伯仲，墾田突過五千萬頃之多，其數不能無疑。秦前朝後代墾田的數字比而觀之，我認爲隋書地理志的「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頃」，決爲「一千五百八十五萬頃」傳寫之誤。以人口與墾田兩相比較，歷朝的平均數字，是西漢每人約得十四畝餘，隋朝是三十四畝餘，唐朝是二十七畝餘，到了清朝末年，平均每人所得的墾田不過二畝半。由現代上溯至清季，墾田不增加，戶口不減少，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所以號稱「以農立國」的中華民國，每年必賴大量的洋米洋麵進口始能維持生活水準線下的民族生命，所謂「赤縣神州」快要被人口重量壓沈了！儘管收回甲午之戰以前的喪失土地，恢復完整的權，容將江海沿岸的過剩人口移植於我們自己的可耕之邊疆，若無現代科學和工業基礎，加強我們開發的力量，那一片滾滾的風沙終必吞噬掉中華民族。何況東北、西北、地下地上所蘊藏的豐富資源，又引進侵略者的魔掌。習以光自滅，象以曲焚身，瞻念我們的民族前途，其是不寒而慄。

歷史昭示我們，中華民族，不怕嶺南的溫濕，最怕漠北的寒風。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天南的溫暖氣候已不允許我們民族作逃命樂園之想了。永嘉之亂，靖康之難，有名的民族歷史慘劇，不幸而重演於今日，那末，生長在江海沿岸的人們，請早日收拾簡單的行囊，準備「全體放逐」於無何有之鄉，留下膏腴之地讓侵略者來

享受罷！

從全部的中華民族史看，我們國家，治久必亂，總山人口膨脹，生產不敷消費；亂久必治，必由政簡官清，順應生民安居樂業之求；合久必分，總山內政不修，引起外族的覬覦；分久必合，則必有命世的英雄運用軍事的優勢，克服地理上的艱難。生於斯，死於斯，餽粥於斯，葱嶺以東的山川氣候，鍛鍊成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必有勇的民族美德；從這種美德裏又陶冶成和平堅忍的民族性。任何重大的壓力加在身上，我們民族可爲人類犧牲而堅苦的忍受，此仁之教也。任何暴力的侵凌，我們民族也敢於挺身抗拒以謀取天下和平，此智勇之教也。若干次狂風暴雨打擊中華民族，而我們民族終能屢仆屢起轉敗爲勝者，不能不歸功於二千年來儒家的反侵略教育——「尊王攘夷」的傳統思想。這種思想，支柱民族文化於過去，更望其能支柱民族文化於悠遠的將來。不然，我們民族將自暴自棄於優越的地形，而必遭劣勢地理所產生的暴力政治所淘汰。

這本小冊子，旨在自歷史上檢討我們民族有時因爲人謀不臧，地失其利，演出「烏夷索虜」弟兄相斫的醜史，有時因爲各憑天險，意氣相爭，結果是貴賤一體淪爲亡國奴。一部二十五史，幾何不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寫成的！淚有時盡，血有時竭，展望現代新武器的進步，我們民族若不肯一心一德在優越的地形之上積急締建一個統一和平的現代國家以保衛悠久的歷史，逮至第三次人類屠殺大競賽時也許不容中華民族有喘類！

回念過去締造中華民族的艱難，展望將來人類屠殺的工具進步，我不能不學時髦喊出兩個口號，——民族團結至上！國家統一至上！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丁 山識於上海開北竹棚之居

# 分章提要

- (1) 由若干種姓融合而為中華民族的過程。……………一
- (2) 種姓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四
- (3) 書同文、車同軌為奠定中華民族萬世一統的基礎。……………五
- (4) 萬里長城的價值不如五路南征。……………七
- (5) 沙漠中馬上為家的游牧者，為中華民族最大的威脅。……………八
- (6) 牛的動力不如馬，我們牛耕的生產遂常受馬的壓迫。……………一〇
- (7) 漢高祖白登之辱由於步兵，武帝有壯盛的馬隊所以征服匈奴。……………二
- (8) 漢平西羌也賴馬力。……………五
- (9) 世界第一個探險家張騫通西域與西域諸國的歸順。……………六
- (10) 水陸並進伐朝鮮，征南越。……………八
- (11) 以馬制馬、以船制船，奠定了漢族的疆土。……………一〇
- (12)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的永嘉南渡與文物南遷。……………一〇
- (13) 西北馬蹄陷入東南湖沼——肥水之戰。……………一五
- (14) 虜馬飲江水，歸燕巢林木，南北朝對立的慘史。……………一〇
- (15) 魏孝文帝用夏變夷促進民族的銜合。……………一一
- (16) 天監不足恃，中華歸一統。……………一二
- (17) 隋文帝不顧私情，慎選良吏，用成一代之盛。……………一三
- (18) 地理上的南北阻隔，讓煬帝鑿通了。……………一四

- (19) 貞觀之治由於天下爲公，選賢授能。……………三五
- (20) 人類之王「愛夷狄如中華」。……………三七
- (21) 以安民爲甲兵，以名將爲長城，塞外的鐵騎爲我們的步卒所屈服。……………四〇
- (22) 大敗倭國之後，士氣衰落了。……………四一
- (23) 安史亂後，藩鎮割據，契丹抬頭。……………四三
- (24) 盪酒釋兵權，養兵以自困；與士大夫治天下，天下之民不聊生，嗚呼北宋。……………四四
- (25) 南軍使船如駛馬，苟全了南宋的君臣。……………四八
- (26) 襄海、高路斯山、都防止不住「世界侵略者」。……………五〇
- (27) 蒙古馬隊踏平東歐。……………五一
- (28) 鴉兵撤星陣趕得人類無去處。……………五二
- (29) 會通河對於民族的貢獻，種族階級對於漢族的摧殘。……………五四
- (30) 破天荒以淮南步兵完成北伐大業——明太祖。……………五六
- (31) 驢子軍，越沙漠，成祖遠征不能根絕三衛之禍。……………五七
- (32) 女真再起，流寇亡明。……………五九
- (33) 人口由二千萬膨脹至四萬萬，清初也是中華盛世。……………六二
- (34) 政治不進步，禍從海上來。……………六五
- (35) 還是運用我們基本的生產動力擊敗海洋的侵略。……………六七
- (36) 二千年來威脅我們民族的暴力又復活了！……………七一
- (37) 總結——沙漠是中華民族的首腦。……………七二

#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一名「沙漠的侵略」——

(1)

推考我國古代經界沿革的，就現存的一切史料看，還是以禹貢爲最古，也最有價值。禹域九州的區劃，大概是：

〔兩河之間惟〕冀州，（上五字據呂覽補）

濟河惟兗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揚州，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河惟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這種超脫政治區域而以山川爲經界的敘述，可以奉爲我國自然地理學之祖。利用這種自然區域來研究古代民族分佈情形，也是極可寶貴的文獻。

禹貢所以首敘冀州者，自來傳說，以爲陶唐氏都城所在。驗以夏書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哀公六年左傳引）那末，兩河之間，汾水流域，自古爲陶唐氏根據地。商周之間，還有唐杜氏存在。周襄，晉繼，這個區域，遂爲晉國所佔據，所以呂氏春秋有始覽說：「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

濟水黃河之間，正是商王所常游幸之地，可以說商代的王畿。商代王朝覆滅之後，宗周王朝封建其嫡親子弟康於衛，以鎮撫商國的遺民；所以有始覽說：「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

北海（今渤海）以西，泰山以東，最早是爽鳩氏土地。公羊對齊景公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昭公廿年左傳）大概，爽鳩氏，就是曷夷的先祖，殷商時代，稱爲夷方。宗周王朝興盛了，封建外戚於此，以鎮撫東夷，所以有始覽說：「東方爲青州，齊也。」

泰山以東，東海以西，淮水以北，這是淮夷的本土。淮夷之中，徐方曾經強盛過，秦經宗周王朝的征討，並且封建周公的長子於魯，以鎮撫之，所以有始覽說：「泗上爲徐州，魯也。」

過了淮水，南至長江，東至於海，這是島夷的舊地。島夷，大概就是舒舒，——舒蓀、舒鳩、舒甌、舒鮑、英、六諸國，所謂皋陶氏之後也。夏后氏之時，有南巢國。商周之際有工叢國。後來越王勾踐破吳，佔有其地，所以有始覽說：「東南爲揚州，越也。」

荆山以南，衡山以北，長江兩岸，自古爲荆蠻百濮諸族滋蔓之地。後來百濮併於荆楚，楚爲荊州大國，所以有始覽說：「南方爲荊州，楚也。」

荆山以北，黃河以南，初爲夏后氏的根據地。商朝滅夏，封建崇國和密須氏於此。宗周崛起，建陪都於夏后氏故居，是爲成周。宗周既滅，王朝遷居成周，所以有始覽說：「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

華山以南，峽江以北，自古爲巴蜀諸族的疆宇。宗周王朝，曾封楚其支庶子弟於巴，以鎮撫西南夷。後來巴併於楚，蜀滅於秦，到了戰國時代，巴蜀區域沒有獨立國家；所以有始覽不提梁州。

河水，自積石山以東至晉陝兩省的界河，這就是涇渭經流的區域，是宗周王朝的發祥地。宗周滅了，秦人繼有其地；所以有始覽說：「四方爲雍州，秦也。」

戰國七雄，燕爲後起。當燕昭王擊敗齊湣王以前，其地多爲羣狄所據。但在殷商，則爲北國，近於王畿，也有很多的侯國。在宗周時代，政令似乎不及，所以禹實無幽州。到了周不韋著始覽時，燕已突起爲東北大國。因爲作者時代背景不同，所以呂覽有「北方爲幽州，燕也」的新說。

舍卻呂覽作者時代背景不談，而從歷史上考察禹實九州區分的意義看，各州的名義，顯然猶各個種族問題在裏面，要而言之：

兩河之間，汾水流域，是陶唐氏故都。

濟河之間，河水沖積地，是殷商故居。

泰山北海之間，濰淄兩水流域，是萊夷故居。

泰山淮水之間，泗水流域，是淮夷故居。

江淮之間，有巢氏故居，吳越之族也。

荆山以南，兩湖盆地，是荆楚民族故居。

荆山黃河之間，伊洛流域，是夏后氏故居。

華山峽江之間，漢中盆地與成都盆地，是巴蜀諸族故居。

黃河以西，渭水盆地，是宗周故都。

夏后氏本居豫州，亡國之後，一部分遺民逃入揚州的南巢氏，一部分遺民北走冀州而爲匈奴。殷商王朝覆滅

了，遺民被周人瓜分爲魯、衛、宋數個侯國；一部分遺民被迫遷於豫州的成周。當宗周王朝盛時，廣封親戚子弟，沿黃河東進的，有虞、虢、那、衛、燕諸國；沿濟水東進的，有曹、魯諸國；沿汝水東進的，有蔡、蔣諸國；沿漢水南進的有隨、唐諸國；沿汾水北進的，有晉、霍諸國；總計起來，新建同姓異姓的國家，不下七十個。加上夏商的舊國，如唐、杜、陳、杞、英、六、彭、楚……散居江、淮、河、漢、濟、汾諸大川澤沿岸的公侯伯子男國家，多則千數，至少也不下三四百個。宗周覆滅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大併小，強兼弱，到了戰國，大國不過六七個，小國不過十幾個。大國的元首，稱王不足，又想稱帝。在一羣外交家縱橫捭闔之下，在一羣軍事家攻城野戰之下，封建制度自然崩潰而漸趨中央集權的郡縣時代。秦始皇帝以萬世之雄，承襲祖宗六世的餘烈，由蠶食而鯨吞，數年之間，盡滅東方諸國；於是九州萬國不同種姓者不再藉高山大川的保護，各自爲政，而融合爲一個民族。我中華民族幾經內部的紛擾，外族的蹂躪，而終能够日月重光，轉弱爲強的基本力量，由今觀之：我們不能不崇拜秦始皇的郡縣制度；尤不能不崇拜他的「書同文，車同軌」兩大政策。

## (2)

我國現代的版圖，西起東經七十三度四十分帕米爾高原，東至一百三十五度十分烏蘇里江；南自北緯四度南沙羣島起，北至五十三度五十分薩彥嶺止；東西相距約六十二度餘，南北相距也有四十九度之遙，國土面積，比較秦始皇帝國時代已經擴張了若干倍，地形上顯然又增多了若干高山大川的阻隔。每一重山川阻隔，氣溫差異，輒產生一種風俗、習慣、語言、宗教等不同的現象。「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兩湖盆地區的語言，自古與山東半島有別，所以生長在徐州的孟子管罵荆州學者許行爲「南蠻鴟舌之人」。就以現代說，廣東語言有異於福建；福建語言有異於江浙；江浙語言又適異乎陝甘諸省。人民的生活習慣，也不免各有特徵了。東南氣候溫溼，河流縱橫，所謂魚米之鄉也；所以生長在這個區域的人，自然以魚米爲果腹的主物。西北氣候

乾燥而且寒冷，魚蝦的生產極少，稻米產量也不多，這個區域，農業遠不如牧畜的發達；所以生長在西北的人，多好肉食酪飲。道在洛陽伽藍記裏有個故事，可以為證：

「王肅在江南，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西元四九四年），背逆歸順。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鱸魚羹，渴飲茗汁。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問肅曰，即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何如？若飲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是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為邾莒小國；唯若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李彪曰，沽酒老嫗魏注玩，屠兒割肉與稱同。甄瑗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鐘賜彪。翻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自是朝貴宴會，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卷三城南篇）

這個故事，將南方人好魚茗，北方人好羊酪，由於生長在水鄉和大陸人生活習慣不同的緣因比較得最明白。荀子說：「吳越之人，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不如漢書地理志的「民風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說得更深切。風氣屬於天文學、氣象學，水土屬於地理學、地質學，換句話說：種族的差別，是受地理的影響；人類的歷史，也完全受地理支配。

### (3)

秦始皇完成了極艱鉅的統一工作之後，看出來種族的界限，由於山川的阻隔，影響人眾的文化，不能暢通；於是整理全國的車軌，使之寬狹相等，道路彼此銜貫，以打破過去列國各為國防而建設的個性交通工具和道路。並且，「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六尺為

步，寬約三十丈），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晉書）這條三十丈寬的公路，大概以首都咸陽爲中心，北通九原（約當賀蘭山附近）；南通會稽（今浙江紹興）；衡陽；東通琅琊芝罘（今山東半島）；西通鶉頭山（約當今甘肅平涼縣）。馳道的功用，雖然以供皇帝巡遊天下爲目的，便於軍事運輸。翻開地圖看，我國的主要河流，都是自西向東，國家的交通，利於東西，不便南北；所以我們民族性，相當的有南北之別，而鮮有東西之差。這條馳道，北起賀蘭山，南至衡山會稽，正是以人力征服了南北交通的天然障礙。我中華民族，所以不受地形的支配，不因河流交通分裂爲若干小國，終能够奠定萬世一統的基礎，不能歸功於秦始皇帝「車同軌」的偉大政策。

「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時代各國通用的文字，有點兒隨着區域語言各自發展的趨勢。假使聽其自然演變下去，燕自爲燕，齊自爲齊，趙自爲趙，魏自爲魏，荆自爲荆，楚自爲楚，周自爲周，秦自爲秦的，各自形成一種特殊文字，一定像拉丁文逐漸分化而爲法文、德文，從此德意志、法蘭西也永遠不能和意大利同化而爲一個國家。何況我們的古代，也是秦楚不同種，燕趙不同宗，種姓的大同小異，和法、意諸國情形相似。由於地形的自然區劃和封建餘力的殘留，分裂爲三五個獨立國家，也是自然的趨勢。秦始皇併兼天下之初，採納李斯建議，立刻以秦國通用文字爲主，整理文字，廢除六國所用奇形怪狀草率從事的字體，令當時的詔令文書，金石刻辭，一概改用秦篆。秦篆比較六國文字，形式整齊得多，東方人寫慣了簡筆俗字，當然不贊同秦篆。同時，東方人——六國的士大夫深受儒、墨、老、莊思想的薰染，都是迷戀那五霸不如三王，三王不如五帝的封建以前黃金時代，對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又不滿意。一班頑固士大夫對於朝政，「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總是「道古以害今」，——用古代封建制度，誹謗當時中央集權的新政策；這派復古思想，可以危及大秦帝國的大一統。秦始皇又採納了李斯建議，將列國史記都焚燬掉，民間敢有私藏那復古議論的詩書百家語者，也都送到官府去銷燬。這從我國學術史看，當然是摧殘文化的暴君；若從全部的中華民族發展史看，正爲我們「建萬世之功」

了！假使，不是秦始皇由思想的統一建立統一帝國的深厚基礎，那末，剛纔綜合成功的中華民族，立為復古思想所分解，恢復古代乘險割據的局面。不是秦始皇以「書同文字」的政策征服五方殊語別國方言，我內容複雜的中華民族，決不會銜合如今之堅固。容我再客觀點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即以便成書同文字的政策；書同文字，即以奠定中華民族萬世一統的基礎！

由於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兩大政策，消滅我們民族統一的地理障礙和語言障礙，然後中華民族，儘管有梟桀之士稱王稱帝，造成一時的分裂現象；然而歷時不久，必有命世英雄，掃蕩羣醜，適應民族心理，制國家於一統，再與好侵凌我們的外族搏鬥。

(4)

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所遭遇嚴重的威脅，初則來自西北兩方，後來逐漸轉到東北。商之鬼方，周之獯狁，春秋時代之赤狄白狄，戰國時代之東胡匈奴，彼盛此衰，不斷的侵略我們邊土。賴商周兩代聖君賢臣不斷的征討，逐漸的將東胡北狄逐於桑乾河以外，遼水以東；然終不能一戰而撫有其民衆。一旦，我們國家發生內亂，那些外族又來乘虛而入，擄掠我們民衆和物資。戰國時代，除了趙武靈王、李牧、及燕將秦開幾度破走東胡匈奴千里之外，其餘的列王名將，都集中國力從事內戰，對於北方的勁敵，只有各築長城，以為消極的防禦。「趙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亦自造陽至襄平，築長城。」秦昭襄王時，滅了義渠國，也在關西、北地、上郡一帶，築長城以拒胡。當秦始皇一統中國時，匈奴頭曼單于又南侵河套以南諸地。始皇聽到「亡秦者胡也」的謠言，恐怕頭曼要來推翻帝國，適命內史蒙恬將了三十萬衆北擊匈奴，收復了河套以南。又將秦趙燕三國的長城修築起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因地形的險要，築爲要塞，延袤萬餘里。這條偉大的國防線，可以說是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工程。可是，這樣偉大的工程，二千多年來，始終限制不了塞外的馬蹄；我

們漢族始終不勝塞外鐵騎的踐踏而一步一步的南遷。

漢族的南遷，也是秦始皇爲我們奠定基礎的。他覬覦南海的象犀珠玉，使尉屠睢將五十萬衆，分五路南征：一軍出鐔城嶺，一軍出九疑山，一軍駐守番禺城，一軍防守南野界，一軍結合於餘干水，並且鑿渠通道，以輸糧餉。轉戰三年，殺了西嘯君（詳見淮南子人間篇），開闢了桂林、南海、象郡，這就是今日的兩廣以及安南的北部。這次遠征，不啻爲我們中原同胞預備了兩千年來的避難所！

(5)

雄偉的北方國防線——萬里長城，果真能够保障我們民族的萬世安全嗎？兩千多年的史實告訴我們，那同馬其諾、齊格菲的堡壘一樣，也不過是一種精神安慰罷了！

何以故？

我不妨武斷的先說：天然的山川阻隔，秦始皇能够用人工征服了；人工所造成的國防堡壘，也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攻擊。千古以來，決沒有攻擊不破的金城湯池，卻有征服不倒崎嶇不定的大戈壁，——沙漠，直至今日，還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威脅！

沙漠，橫臥在長城的北面，西自葱嶺起，東至黑龍江邊境止，蒙古新巔兩個廣大的區域，幾乎爲沙漠掩覆了一大半。沙漠，蒙古人稱爲「沙陀」。張德輝邊境紀行說：「喀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嶺邱阜，既至，則皆積沙也。」積沙成邱，一層層的卷起來，彷彿海水的浪頭，所以古人又稱之爲「瀚海」。海，何等的浩瀚呵！一望無際的瀚海，是經年不見雨水，一日之間，天氣有四時的變化；——當日出的時辰，像春天；中午，炎熱像夏季；傍晚的時刻，又轉變成秋天了；入夜，溫度就降到冰點之下，寒冽如隆冬。氣候的變化如此激烈，土地又是那樣子乾燥，當然是草木不生，五穀不長，任何高度的耕種技術，也不能使這裏的生產



力土。

(6)

長城以南，氣候不像沙漠中變化的激烈，雨量也漸漸多了。加以黃河、汾河、桑乾河諸大河流的灌注，土壤也比較草原溼潤得多；但又不如江南的潮溼。這正是自游牧生活進步到農業社會最理想的區域。我們民族的古代文化，如舊石器、新石器時代的遺物，多數發現在黃河沿岸的緣因在此。這個接近沙漠地帶是漢族文化的搖籃，也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史記貨殖傳語）秦人都關中，近河渭之汭。每個種族之起，大抵不越黃河沿岸。等到農業發展到園藝時代，黃河流域的天時地利，又不如江淮以南的優越，我們經濟的中心，遂逐漸向南方轉移；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文化中心也逐漸轉移到長江流域。轉移經濟文化的原動力，固然多因。我認爲天時地利還是次要；最重要的壓力還是那背寒向溫的馬蹄。

將生產品的價值比較一下：五畝地所長的野草，不能供給一頭牛、一匹馬的終年食糧；成熟的麥田，五畝所生，足夠一個人全年之食了；所以在殷商時期，我們的生產基礎，已漸放棄游牧，從事農耕了。但是，田的生產，種麥子又遠不及種稻的收穫之鉅；所以周秦以後我們的農業生產漸以稻米爲主。麥田，可以鋤耕，可以淺淺的播種，不妨完全用人力；若種稻子，需要水浸，需要深耕易耨，人耕，遠不及牛耕效力之弘遠了。從全部的商代甲骨文看，只有「句黍年」，「句麥年」的記載，似乎尙未發現稻字。一直到了西周中期的文獻，見「稻粱」並稱的銅器銘文。我認爲牛耕的技術，與種稻有關。葉適說得好：「世人多言牛耕始於漢趙過，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以名字解詰的方法證明牛耕已見春秋時代，這是極可信的。那末，我說：牛耕由於種稻子，或者發明於宗周時代，絕非臆必之辭了。

農業，耕種有定期，收穫有常時，稻子收穫了，立刻要種麥；麥子收穫了，立刻又要種稻種豆子，永遠是

繼續不斷的工作，人們自然也像麥子稻子一樣，生根在固定的土地之上，生活也固定下來。我們「安土重遷」的民族性，就是從農業生產方式逐漸養成的。農業生產的動力，人工之外，牛力爲主。牛，龐然大物，轉動不靈，舉趾遲緩，又是飽食之後好靜不好動的動物，除非火燒牠的尾巴逼牠衝鋒陷陣，牠根本不適宜野戰的。回頭看那塞外食肉飲酪的人們，有強健的體格，運用那動力超羣的馬，更顯得驍勇英武了。以牛禦馬，永遠是喫虧的。這在北史燕鳳傳裏已經說出其中妙理：

「苻堅曰：『匈奴北人（案指蠕蠕），無堅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兼併天下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丈，馳驅若飛。主上雄俊，卒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擔矜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

牛的動力不如馬，所以牛性的南人老是遭受馬性的北人踐踏。左氏昭公四年傳說：「冀之北土，馬所生焉，無與國也。」春秋以前的歷史，是否完全如此，尙待研究。若拿秦漢以後的歷史看，那就適得其反了。五胡之亂，拓跋氏之統一黃河流域，契丹、女真、蒙古之虎視中原，都是起自冀北然後宰割塞內的。

從天追尋水草的區域，一旦踏到黃河沿岸，水，固然是所在皆是；草，更其豐茂了。元魏統一了中原，很想將塞外的馬牛羣完全移到黃河沿岸，會將渭河的沃野良田，改闢爲牧場。也許因爲水上不服吧？不到十年，成羣的駿馬，或病或死，只好還牧場爲良田。從此以後，踏進長城的游牧者佔據了中原，也只得「用夏變夷」，逐漸同化爲農業生產者，所有的人們也逐漸溶化於漢族了。如今的漢族中，許多大姓，如元氏、懷氏、顏氏、金氏、宇文氏等，追溯他們的遠祖，大多數是從塞外來的。這種民族同化的原動力，一般人認爲漢人有高度文化，當然要征服那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我認爲這僅能道出一部分理由；最高的壓力，應該歸諸長城以內，氣候溫溼，土壤較潤，不適宜於馬的蕃殖。說到這裏，可以明白指出，是：萬里長城，不能堅阻生長在沙漠游牧者馬蹄的攻擊；馬蹄踏進長城之後，他們也不勝低氣溫的壓力，自然接受農業文化而同化於漢人。一

部中華民族盛衰史，大概像牛馬搏鬥樣子斷斷續續的馬進則牛退，牛盛則馬衰；而馴順如牛，又遭新馬的攻擊。

(7)

黃河下游的沖積地，平衍千里，適宜車戰。利用馬的動力曳引戰車衝鋒陷陣，似乎是平原環境造成的。春秋時代，車戰之盛，已達到頂點了，但是，北方的戎狄還是用步兵。如隱公九年左傳（紀元前七一年）說：「北戎侵鄭，鄭伯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到了魯昭公元年（紀元前五四一年），晉國中行穆子大敗狄於太原，受了地勢的壓迫，模仿狄人，毀車虐卒，可見狄人那時也還不知利用馬力。戰國後期（約紀元前三一〇年），趙武靈王爲了國家安全，突然的「胡服騎射」。胡服之爲仿效胡人的服裝，不待煩言；騎射，是武靈王自我作古呢？也還是學習北方胡人呢？從史記「遠胡服，招騎射」語氣看，似乎這種技術先盛行於民間，故可以立刻招集爲騎兵隊。民間的騎射，是國人自己創造呢？還是得自胡人的傳授？今亦不可知。所可注意者：從此以後，胡人知道利用馬力作戰，而多與國了。

以漢高祖之雄武，威加海內，統率三十二萬大兵北逐匈奴，反被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今綏遠定襄縣），七日之久，賴妻敬的美人計，纔得脫圍而出。孤軍深入，固然犯了兵家大忌。最重要的緣因，還是步兵不敵馬隊。史記匈奴傳說得好：「漢兵逐擊匈奴，多步兵；匈奴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烏驪馬，南方盡騂馬。」當時匈奴馬隊聲勢如此的壯偉！反觀漢室，則「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蔽蓋」，（史記平準書）連皇帝的大駕，馬色也不全，如何談到戰馬？這真是國家的致命傷！高祖深知無馬不能與匈奴決戰，只得忍氣吞聲留待子孫爲他復仇了！錯說得好：

「今匈奴地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灑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

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荐，弗能支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中國的長技在步兵及車騎，匈奴兵的長技在騎射；所以中國人要想抵禦匈奴，一定也要訓練馬隊。漢文帝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既已獎勵人民養馬；同時政府又沿西北兩邊設六苑三十六所，派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利用西北寒燥地帶大量的繁殖官馬。加之文景兩帝勵行節儉，以獎勵民間生產，充實國家的府庫。等到武帝即位，「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康庾皆滿；而府庫餘財貨；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的經濟力量，是很充裕了。「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擠而不得聚會」；民間的馬如此之多，公家的馬更其盛了。武帝憑藉了這樣雄厚的國力，纔敢下報仇的決心，遠伐匈奴。

第一次的出征在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年），徵發三十餘萬衆，分屬驍軍、驍騎、輕車、將屯、材官五將軍，大概以步兵爲主，輔以戰車和騎兵，運動週綏，所以無功而還。元朔以後，改用騎兵爲主，以流動性最強的馬隊對付那飄忽不定的匈奴騎兵，然後大戰大捷，小戰小捷，將匈奴的主力逐漸擊潰。歷次出征的騎兵數量，約略計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車騎將軍將三萬騎出雁門。

元朔五年，車騎將軍將三萬騎出高闕，蘇建爲游擊將軍，李沮爲強弩將軍，公孫賀爲騎將軍，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凡十餘萬人，擊匈奴。

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三月，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夏，去病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出北地。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四年（公元前一九九年），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又數十萬人，出定襄、代郡。……是後，匈奴遠遁，而漢南無王庭。

天漢二年（公元前九九年），遣武師將軍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天漢四年，遣武師將軍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因杆將軍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

征和三年（公元前九〇年），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

騎出酒泉；擊匈奴。軍大敗，武師遂降。

征和四年，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前後用馬約在四十萬匹以上。尤其是元狩四年的出征，規模最大，出塞之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單對匈奴戰爭，馬的損傷如此之甚。加上，伐朝鮮，平南越，通西南夷，遠征大宛，馬的消耗匹數，應在百萬以上。文景兩世的蓄積，經過這四十年間的南征北戰，消耗盡了，我們這位好大喜功的大皇帝，只得做其雄心，詔罷輪臺遠戍。過去的史家，都歌頌大皇帝善於悔過。現在再從罷輪臺詔的「修馬復令」看，同時又令「郡國二千石以上進畜馬方略」，這顯然說明武帝晚年「不復出軍」的主因，是由於馬的動力消耗淨了，決非他勇於悔過也。

匈奴遭受這二十餘年不斷的痛擊，馬畜都孕重墮殖，殘敗不堪，從此以「馬上戰鬪為國」的匈奴，日漸衰微，內部逐漸分裂，對漢朝，由「求和親」而「款塞入降」，大部分降為漢朝的藩國。到了漢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七二年），田廣明、范明友等五將軍，分將了十五萬騎，與烏孫國五萬騎，會攻匈奴，匈奴毫無還手之力了，只有「老弱奔走，驅畜產遠逃」。從此，匈奴衰耗，分為南北。南匈奴歸順漢朝，徙近邊塞，以為不侵不畔之臣。北匈奴逃到康居，又被駐在西域的漢騎都尉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用奇計殲滅了。到了後漢，北匈奴

漸漸的死灰復燃，內犯五原雲中，又攻擊西域各國，圖謀恢復他的舊勢力。賴大將軍竇憲在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大張撻伐，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一直追逐到北碣海，勒銘於燕然山。過了兩年，又遣耿种和任尙出塞五千里，窮追北單于金微山，大破之。從此，「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往」。據梁任公先生考證，遣支匈奴馬隊，「至晉武帝南康二年（公元三三四年），卒侵入歐洲，開西方民族大移徙之局」，現在歐洲的匈牙利國，就是北匈奴後裔。敗兵之將，不足言勇；這支殘兵敗將，居然能遠征歐洲，第一次顯示東亞民族的勇敢與威力，也只爲生長在沙漠從事游牧生活的人馬，纔有這種氣魄，偉大的沙漠呵！偉大的游牧者！

( 8 )

另一個威脅中原的馬隊，就是西徼之外的羌人。這個種族，春秋時代，稱爲姜氏戎，一部份人曾被晉秦兩國自瓜州遷移到伊洛之間。秦漢之際，他們勢力伸展到河湟以東，幾乎佔有現在的甘肅全境；並且通好匈奴，以擾亂西北邊陲。賴票騎將軍霍去病的神勇，收復了胭脂山之後，再於祁連天出一戰而擄匈奴的休屠王，武帝就在這個新收復區添設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隔絕了羌胡交通路線。從此，羌人勢力也逐漸退出河湟以外。當時，匈奴人更其悲悼祁連山的喪失，而歌之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因爲漢使義渠安國行視諸羌，殺戮不當，逼成羌亂。宣帝起用老將趙充國用屯田政策，把豪強先零種困服了，於是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新莽時代，羌人乘虛入塞。到了後漢初年，先零羌又進寇臨洮，雖然被馬援擊平了，可是後漢一代，羌人的勢力，日漸猖獗，由隴西而北地、上郡，直犯三輔。另一支羌衆，直竄到河東、河內。當時政府，一方面在淪陷的郡縣，到處築塢寨（即今碉堡），以制衝要；一方面迫令居民到河南避亂。安帝即位之初，派遣當時第一流軍事學家任尙爲中郎將，統率羽林軍出征。臨行，虞詡向他說：

「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尼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

任尙接受道「以馬逐馬」的妙計，果然擊潰羌衆於丁奚城（事在公元一〇九年），逐漸肅清三輔和益州的反羌。所餘的西羌，卒被皇甫規擊破；東羌又被段熲殲滅。直至熹帝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中國的羌禍，纔告肅清；然而，國家元氣已大傷了！

## (9)

漢武帝所貢獻於世界史的大事，無過於使張騫通西域了！

古史所謂西域，大概指今新疆以西，至於地中海東岸，包括亞洲的中部和西部。這中間隔了一座帕米爾高原，硬將亞洲分隔成兩個世界。在新疆與敦煌之間，又橫臥着一條白龍堆；將中原與新疆的交通路綫又加上一重障礙。周秦兩朝，所以只能東下，不能西進的緣因，正爲新疆戈壁所限也。雖然，周穆王好遠遊，也不過游到祁連山就折回了（詳拙著河出崑崙說）。龍堆以西，依靠大戈壁的保護，一向在匈奴侵略下各保守其封建的勢力。武帝知道要是征服匈奴，必先聯合西域，組織同盟，以斷他的右臂。

當着民族的盛世，總會特出若干智勇雙全的人物，因緣時會，而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使民族的力量發揮得格外偉大！世界史上第一個大探險家——張騫，接受武帝的命令，帶了百餘人，出關西，經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而歸中國。來，去，都爲匈奴所據，經過了十三年之久，僅贖他和隨從甘父，兩個人逃回來。此行結果；第一，發現西域面積的廣大，廣大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其次發現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比較國產的馬雄健多了，這是我們大皇帝所最需要的。在地理學上，張騫發現葱嶺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

流，注於薩澤（即今羅布泊），葱嶺是亞洲分水嶺。其次，在大夏國發現國產蜀布和邛竹杖，推測中國和西亞的國際交通線，可以避免新羅的戈壁而自今之四川、雲南、經印度直往波斯；這也是我們大皇帝所最感興趣的。武帝根據這份探險報告，當即發使四出，出魏，出冉，出徙，出契，探尋往身毒國（今印度）直接的交通線，將已經作罷的通西南夷計劃，立刻恢復起來。因為昆明池附近多盜賊，時常危害使臣的生命和行裝。武帝下了決心，便在長安城外也鑿了一個昆明池，訓練水師，以為討伐滇國的準備。滇國終於屈服，而為今日中華民族復興根據地的雲南省。但是，這條國際路線，武帝時代，始終不會打通，一直等到兩千年後，我們神聖抗戰的勝利前夕，利用現代的機械力量，纔冒犯毒蛇瘴氣，鑿山通道，完成他的計劃。（今日史迪威公路，大概就是武帝擬通身毒的交通線）

馬，也許是國產的不如匈奴，匈奴產的不大如大宛，漢武帝所以最愛大宛天馬！可是，大宛國最好的馬，隱匿在貳師城，不肯進獻。武帝知道了，便派使臣帶了金馬去請交換。宛王以為大宛去漢遼遠，不交換，武帝也奈何他不得，他並且殺了漢朝的使臣。這一下惱怒了我們的大皇帝，立刻徵調那國的勇敢少年數萬人，加上屬國的騎兵六千人，派遣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遠征大宛。誰知西域諸國不會背過漢朝的利害，對於貳師將軍所過，不肯給養，還加以阻撓，大敗漢兵於郁成。貳師將軍只得退回玉門關待援。我們大皇帝向來不肯輸取仗的；於是乎加派五十餘校尉，統率邊騎六萬人，後面轉輸兵糈糧餉的就有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和駱駝也在萬數以上，使大軍得自給養，不再依賴那些小國。恐怕沙漢中缺乏飲水，又派水工多人隨行。另外加派兩名「執驅馬校尉」，準備擊敗大宛，擄取其善馬。如此浩大的聲勢，自然威服了西域小國，莫不出其飲食慰勞漢兵。兵到大宛城下，令水工移其水源，圍城四十餘日，大宛貴人殺其王毋寡之頭以降漢軍。執驅馬校尉選擇了最好的馬數十匹，次等馬三千餘匹，罷兵而歸。西域諸國，聽到宛國雖遠在大漢帝國萬里之外，也免不了大兵的誅滅，曉得沙漢再也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了，從此，西域諸國恐懼而降服了。現在，我們回味那首天馬歌：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余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想到當日大軍的絕漠遠征，奏凱而回，這纔是我們民族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這是公元前一〇一年事）

武帝死了，昭帝即位，國家的威望，在短期休養生息之下，越發發揚光大了。傅介子以一介使臣殺了匈奴使者，討伐樓蘭國，改其國名為鄯善。龜茲國爲匈奴利用殺害漢朝的校尉，常惠出使西域，與吏士五百人，發了西域各國的兵討其罪。到了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設西域都護，進而屯於北胘鞬披、莎車之地。這時，西域五十幾個國家，在大漢帝國保護之下，不再爲匈奴的賦稅所困，而得享受和平之福。

不幸，王莽弄權，造成漢朝的內亂，使國家無暇兼顧邊國的安全。北匈奴抬頭了，西域與國家的關係也中斷了。一到光武中興，國家秩序恢復，西域諸國，懷漢威德，相率而來朝貢，請朝廷再設都護護衛他們。當和帝永元三年（公元九一年），恢復了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諸官，賴着智勇雙全的班超，學力俱強的徐幹，和衷共濟，恩威並用的經營；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我們民族的聲威，在西域方面的發展，實駕西漢而上之。可惜，班超的隨員甘英，走到地中海邊，不敢冒險西航去訪大秦，使大漢帝國的文物，不會直接傳達到羅馬帝國；中西文化的交流，居然受了一海之隔，而遲了千餘年。假使武帝死而有知，也該憤恨於九泉之下吧！

(10)

以馬制馬，漢武帝對於西北兩面的邊防，已經獲得戰略上極大的成就了。他對於東南兩面，也能適應地理的環境，訓練水師，以謀滅那些不知順逆的小國。

朝鮮之役（元封三年即公元前一〇八年），命左將軍田遼東，樓船將軍楊僕泛海東進，水陸並進，會師王險城下，朝鮮國人殺其王右渠和大臣成己，以降，武帝即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從此，朝鮮人完全接受漢族文化，長爲中國的東藩。

自從秦始皇五道征南越，慘敗而還，南越、東越，有時五爲犄角之勢，稱帝稱王，竊號自號；有時彼讎彼界，互相侵伐，乞援於漢朝。當時，士大夫認爲越，是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必煩中原人去經營，如淮南王劉安上書諫武帝伐南越云：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箕竹之中，習於水門，便於用舟，地溼味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勞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那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且越人絲力游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餐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閩江、珠江一帶的氣候如此溼溼，地勢如此險阻，不但與沙漠地帶「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天然形成兩個世界；就是生長在黃河流域經過農耕訓練的人，也受不了蟲蛇之螫，水蒸地毒的威脅。當時反對武帝派遣大軍南征者，當然不止劉安一個人。武帝終於悍然不顧，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湓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戈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灘水；下潮將軍甲，下蒼梧；徵發江淮以南的十萬水師南下。又發巴蜀罪人和夜郎兵下牂柯江。又是五路出兵伐南越。不待戈船、下潮諸軍和夜郎兵會師番禺，南越國就降服了。武帝因南越的土地分設交趾、日南、九真等九郡，將大漢帝國的版圖，伸展到印支半島，爲中華民族中衰的時期預備了廣大的避難所。後來，永嘉之亂，靖康之難，我們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民衆，不勝塞外馬蹄踐踏，相率南渡，也賴那林深水險，得以苟延民族的生命，不能不拜漢武帝勞師南征之賜。

可是，平了東越之後，將其人民悉數遷於江淮之間，那未免失策了！

(11)

漢武帝驅逐了匈奴右賢王，開闢了酒泉、張掖、武威、敦煌四郡，以奠定今日甘肅省的基礎；通西域，進屯田輪臺，以奠定今日新疆省的基礎；通西南夷，開闢了越巂、沈黎諸郡，以奠定今日雲南省的基礎；平兩越，開闢了交趾、珠崖諸郡，以奠定今日兩廣的基礎；平朝鮮，開闢了真番、臨屯諸郡，以奠定今日東北諸省的基礎；我中華民族得有今日複雜而且偉大的氣象，都是他老人家一手為我們開闢的。他的偉大國策：不依賴死的長城國防線消極的保守國土，而是以動的馬力還攻沙漠的馬隊，以流的水力還攻南越的水師，利用一切活的動力征服地理的障礙，將我們全民族造成適應地理環境的動力，以積極征服那四圍的不同動力。我們民族地廣人衆，又有高度文化的組織和訓練，動力特別的雄厚，所以能擊破四圍的各個種族而造成我中華民族千古未有之盛。現在，我可以勉強定個原則說：民族之盛，由於智勇雙全的領導者善於運用民族的動力以克服地理的阻礙；其衰也，民族的動力，甘為地理所支配，一羣領導者也樂得藉地理保護而過其偷生苟安的生活。後項原則，可自南北朝的分裂史實，加以說明。

(12)

兩漢國策，影響我們民族最深者，無過於將歸順的外族遷入邊塞以內，利用他們的力量為我們防禦外患。結果，邊陲得了暫時的安謐，而國家也因此造成了長期的內亂。

漢宣帝以後，匈奴陸續投降了，初欲利用他們保塞，徒諸降人於上谷以西。到了光武帝末年，又徙南匈奴於西河美稷。董卓之亂，漢獻帝依賴匈奴右賢王的護衛，免於李傕之難。建安二十一年，南單于入朝，曹操因分其衆為五部，使散居於太原郡一帶。晉武帝又將塞外所歸化的匈奴遷入河西。從此，平陽、西河、太原、新

興、上黨、樂平諸郡，到處都有匈奴的部落，所謂并州區域，實際上爲漢胡所共有了。郭欽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〇年），曾上疏請防匈奴說：

「我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我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西夷出入之防，明玉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這條長策，晉武帝不但不能採納，反將後來歸降的匈奴一體向中原收容。到了惠帝元康末年（公元二九九年），不但內徙的匈奴，蠢蠢欲動；留在中國的氐羌也躍躍欲試；江統看到這種嚴重的局勢，作了一篇徙戎論以敬告朝廷，說：

「……建武中，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魏武帝令夏侯妙才討叛氐，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并禦蜀虜。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我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觀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奸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毒不可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我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并州之胡，本實匈奴，隸惡之寇也。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矣！……」

誰知當時的昏君賊臣，只知道爭權奪利，各自規取個人的地位，對於這種關切的言論，總是懶若罔聞，置之不理。果然，不出五六年，樊人李特，統率關中的流民，在成都發難，建立所謂成國（公元三〇三年）；匈奴左賢王劉淵，也在并州的離石招集五部匈奴，僭號漢王，恢復他們的匈奴帝國。於是羯胡石勒，鮮卑人慕容儁、慕容垂、慕容德、乞伏國仁等；匈奴人沮渠蒙遜、赫連勃勃等，羌人姚弋仲，氐人居光、苻洪、楊茂搜等，稱王稱帝，各據一方，此興彼滅，雲合獸散的分裂中原，造成中華民族史上空前的大混亂。

這次混亂的造成，固然以兩漢收容降戎爲最大的失策。收容之後，不善於管理教育，聽其自由發展，又放縱漢人凌辱他們，如徒戎論所謂「侮其輕弱，使其怨恨」，這是第二個失策。要而言之：兩漢是引狼入室，種下禍根；晉初則養寇貽禍，自食惡果。這自劉淵的叔父劉宜鼓動匈奴人獨立的話裏看得最分明：

「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滅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劉淵）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衆，此其時矣！」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司馬氏從曹家孤兒寡婦手中篡奪來的天下，偏生養成了一幫不肯的子孫，只知道鬪牆之爭，自相殘殺，當然顧不到民生疾苦，盜賊在望了。等到盜賊擄掠了家主——愍帝、愍帝去當奴隸使喚，青衣行酒，洗爵執蓋，琅邪王還不至幸災樂禍的態度而即位於建康。這從祖邀請兵恢復中原，元帝僅派兩千個徒手老弱給他，可以看出元帝不但無國家觀念，亦且絲毫無兄弟之情，司馬家兒，眞是一幫渾蛋！

自惠帝的賈皇后弄權影響到晉朝政治的腐敗，這是人所盡知的。惠帝還有一位羊后在洛陽淪陷時候展轉被劉聰擄去做壓寨夫人。劉聰問她：「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對曰：

「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被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實爲帝王而

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當時實不think，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當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抱着騷鬚子罵前夫，够得上無恥之尤了！石勒俘獲了一羣晉朝的王公大人，問以晉故。

「太尉王衍其陳禍敗之由，云計不由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勸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勸謂孔叅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

這輩平日只知高自位置謀盡國家的名士，亡國之後，不肯自責，還想將責任卸在別人身上，真是死有餘辜！當石勒倚牆上東門時，王衍看見他的聲音像貌，就知道這個「胡雜，恐將為天下之患」。假定王衍真的憂國憂民，肯為國家負責任，應該將這個胡雜立刻搜索出來，善為處置，不當等他走了「馳遣收之」，敷衍了事。王衍一時敷衍放走了胡雜，最後，他的老命就喪失在這個胡雜手裏，連國家的命運也葬送在這個胡雜手裏。以這輩自私自利不知廉恥的男女把握國家的政權，國家焉得而不崩潰，民族焉得而不衰頹呵！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當晉惠帝的末年，黃河一帶連年的饑饉，加上胡羯的寇殺，關中的人民多向漢中巴蜀流亡；并州的人民多向冀州流亡；這輩乞活，有時也流為盜賊。廣大的中原，在亂兵、胡羯、乞活輩自相掠殺之下，無一點乾淨土。賴着江淮的天塹，限制住胡人的馬蹄，王導王敦弟兄們就在建康輔助琅邪王睿成立偏安的政府；於是中原的士民相率南渡避寇。如習得地理志所說：

「自中原亂離，遣黎南渡，並備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偏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偏置松滋郡、遠隸揚州……」

每經一次內憂，必有一次外患；每經一次外患，必有一批中原人南渡；經過這次「永嘉之亂」，自黃河流域偏遷到

江淮以南的士民究竟有多少？現在無從再作精確的統計。我們但自晉元帝以後所僑置的州郡看，於江淮之間，置豫州、徐州；於京口置兗州；於廣陵置青州；於襄陽置雍州；於揚州之內又置幽、冀、并三州；除了涼、平、秦三州、晉初所有黃河流域的州郡移治於長江兩岸。再從東晉以後高門世族的郡望看：如琅邪王氏；潁川庾氏、荀氏、鍾氏；陳郡謝氏、賈氏、殷氏、何氏；太原王氏、溫氏、孫氏；范陽張氏、祖氏、盧氏；濟陽江氏、蔡氏；濟陰卞氏；泰山羊氏；河東衛氏、柳氏、裴氏、薛氏；京兆韋氏、杜氏；滎陽鄭氏；弘農楊氏；河內山氏；潯水翟氏；平原賈氏；北地傅氏；平昌伏氏；……大多數不勝胡騎的壓迫而舉族南遷。這幫人物的南遷，當然要將中原的風俗、習慣、學術、思想，都帶到江南來，促進江南文物的進步。同時，江南人火耕水耨的習慣，也蒙受中原耕作技術的影響，而逐漸改良，以提高農業的生產，逐漸將中國的經濟中心轉移到江淮以南。從此，江南人文，日漸興盛，中國的文化中心，也轉移到江南。塞翁失馬，安知匪福？從全部的中華民族史考察，這次「永嘉之亂」，明明的是借我狄的壓力促進中國文化平面的發展；消極的說，其結果或遠在秦皇漢武武力南征之上。不過，當時人民所受的痛苦，太悲慘了！

我們民族，老早從農業生產發成了安土重遷的觀念。從這種觀念裏自然的又產生一種「狐死正首丘」思想。儘管一個人，他生的時候，歡喜雲游四方，等到死時，總希望落葉歸根，歸骨於他的祖宗邱墓之下。所有永嘉南渡的人物，他們總信仰政府有力量恢復中原，讓他們復土還鄉。誰知，晉元帝（即琅琊王）根本不作此想，不但不肯稍微贊助祖逃北伐，並且效忠晉室的河北劉琨和涼州張軌，也不加一矢之援，一任他們自生自滅。久之，殘留在北方可以恢復中原的據點也讓胡、氏們陸續擊潰了。後來，王敦、蘇峻，相繼的武裝逼宮，不暇顧及外禍。桓溫統率步騎四萬，出襄陽，戰藍田，收復了長安，指顧之間，可以殄滅北方割據的羣雄了。中原父老歡喜得眼淚都流出來，攜帶牛酒，歡迎王師道：「不圖今日復見官軍！」誰知桓大將軍又是存心不良，藉着軍糧不足，班師回來。嗣後，再三北伐，總是受了「帝王夢」的影響，不肯努力，反被鮮卑人慕容垂

大敗於枋頭，聲名狼藉；篡位不成，鬱鬱而死。當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四一〇年），車騎將軍劉裕大敗慕容超於臨朐，指顧間可以消滅河北的鮮卑了，偏生有盧循徐道覆之徒的叛變，牽制劉裕不能不回師戡亂。過了七年，劉裕居然又克復長安了。誰知篡位的思想又促動他南歸，與關中父老，揮淚而別。關中不久便爲匈奴人沮渠蒙遜所沒。舜禹之事，劉將軍居然演成了，從此，不再北伐，徒勞「中原父老望旌旗」了！流落在江南的士民，只得採納范甯陳時政疏辦法：

「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豨，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回伍之法。」

「土斷」之後，所有中原士民，便著籍永爲江南之人了！

(13)

說到黃河流域的情況，那更慘了！

匈奴劉淵所建的漢國，傳到孫子劉粲，因爲荒淫無度，被靳準滿門鈔斬了。淵納的劉曜，改國號曰趙，不久又被石勒殺了，從此南匈奴被肅清了。

羯胡石勒所建的後趙，傳到石世，被冉閔「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了二十多萬人，羯胡也完了。

鮮卑人慕容廆初尙效忠晉室，但傳到孫子慕容儼便建立前燕國。儼傳其子慕容皝，爲秦苻堅所滅。後來，慕容垂建立後燕，傳到孫子慕容雲，爲北燕馮跋所滅。慕容德所建的南燕國，傳到兒子慕容超，爲劉裕所俘，斬於建康，慕容氏完了。

晉涼州牧張軌，初亦奉晉正朔，傳到孫子張駿，自稱涼王。數傳至子天錫，降於後秦姚興。

氐人苻洪初仕晉，兒子苻健建立前秦國。數傳至於苻登，也爲姚興所滅。

羌人姚弋仲，仕晉。到了兒子姚萇建立後秦國。傳到孫子姚泓，爲劉裕所俘，斬於建康，羌人政權，也暫時結束了。

氐人呂光，繼張天錫建立後涼國。傳至姪兒呂纂，爲姚興所滅。

鮮卑人秃髮烏孤初爲呂光的益州牧，其弟利鹿孤繼之自立爲河西王，傳位至弟苻健又建立南涼。後爲乞伏熾所殺。

漢將李廣的遠孫李弼所建西涼國。傳到兒子李歆，爲沮渠蒙遜所滅。

匈奴人沮渠蒙遜繼呂光建立北涼國，傳到兒子茂虔爲拓跋氏所滅。

鮮卑人乞伏國仁所建西秦國，三傳至於乞伏慕末，爲赫連定所滅。

匈奴人赫連勃勃建立夏國，再傳到了兒子赫連定，爲拓跋氏所滅。

代慕容雲而興的馮跋，所建的北燕國，傳到弟弟馮宏，也爲拓跋氏所滅。

遼寧胡羯，勃然而興，忽焉而亡，正像一盤棋局，彼進此退，此盛彼消，彼此混殺一陣，驟難看清這個時代的眉目。現在姑將梁任公先生所作五胡十六國興亡表選錄於此：

種名	族名	國號	創業主	國都	公元紀年	被滅
北	匈奴	漢(前趙)	劉淵——劉聰 劉曜	初平陽(山西臨汾) 遷長安(西安)	303——318 319——329	後趙
狄	夏	北涼	(段業)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張掖(甘肅張掖) 統萬(陝西懷遠)	397——429 407——431	後魏



漢		種	
前涼	(張實)張重華	姑臧	33—376
西涼	李嵩	敦煌(甘肅敦煌)	400—413
北燕	馮跋	龍城	409—426
			後魏

(見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蹟論次篇。公元紀年關係編者所增。)

看這短短一百四十年間，居然產生這羣帝王，黃河流域，突然變成東亞的國際戰場；這羣國際人物，所謂「羯胡」，本是匈奴的一支，加上鮮卑、氐、羌、所謂五胡，實只四種。若加上驚人李特所起的成國算，纔真是五胡，當時則又稱為「六夷」。這羣夷狄，對於漢人，多少總含有復仇心理，加以壓迫。石勒即趙王位時，曾經「重禁胡人，不得凌侮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明白規定胡人的地位高於漢人。後來「諱胡尤峻」，漢人提到胡字也許就犯死罪。種族界限，如此嚴峻，不知多少漢人就被「胡」字冤枉死了。再因所以濫殺「高鼻多鬚」的緣因，大概就是羯胡自己逼成的。

五胡之中，只有前秦苻堅盛極一時，滅燕，滅代，滅涼，滅成李，平四域，渾一了華北。他不聽王猛的直言，在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三八三年)，大舉伐晉。發出戎卒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號稱百萬人馬，浩浩蕩蕩的殺奔淮南而來，滿以為一舉而滅東晉，「猶疾風之掃秋葉」，馬到就可成功。誰知苻融所率的前鋒步騎三十萬人已抵潁口了，姚萇所率的蜀漢之兵，方遲遲的順流而下；涼州的後援，方抵達咸陽。內有姚萇慕容垂兩個異種，各懷異志，全軍的意志既不能統一；而軍運不靈，前後不繼，全軍的陣勢又不能首尾相顧，這都犯了兵家大忌。在東晉呢，自從桓溫歸天之後，謝安濟濟的與開國家大政，正如王猛所謂，「正朔相承，上下安和」，君臣之間，無時不以秦寇為憂，敬慎戒懼的求文武良將，募驍勇之士，以鎮禦北方。謝安內舉不避

親，推薦姪兒謝玄統率精銳的「北府兵」，又派弟弟謝石統率水師。他們叔姪兩位，在太元四年（公元三七九年），曾將深入三阿（今寶應）的秦軍驅回淮北。這次秦督苻堅傾國南犯，先鋒攻到潁口，他們叔姪纔受命征討，督率了不及敵人十分之一的兵力，五千米師向壽陽進發（今安徽壽縣）。苻堅未抵肥水，苻堅早已佔領了壽陽。謝玄的先鋒劉牢之以五千精兵敵前強渡於洛澗，首先擊破秦軍前鋒五萬人之衆。苻堅有點膽怯了，登在壽陽城上遙望晉軍水陸並進，部陣嚴整，更有點驚慌了，說：「此亦勁敵，何謂弱也！」秦軍阻肥水而陣，謝玄請他們稍向後移，讓晉師過河來決戰，苻堅允許了。秦軍一退不能止，晉師藉着敵前強渡的時間，就向秦軍追擊。秦軍陣勢亂了，抵不住晉師嚴整的攻擊，所有二十幾萬前鋒隊不暇還擊，就潰不成軍。前鋒大敗，後方動搖，苻堅負傷逃走，到洛陽，收集散兵不過十餘萬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戰」。

肥水之戰，關係中華民族者至爲重大。假使苻堅以氣吞長江之勢一舉而亡東晉，所謂「中華正統」便告中絕，從此天下便爲傭人所有了。所幸秦的內部種族意志不能統一，加上苻堅屢戰屢勝，勝則驕，驕兵當然必敗。這些精神上敗兆，我認爲不如地理形勢更爲險惡。以壽陽爲中心看，北當潁水、沙水、夏肥水諸川入淮之會；東阻肥水，西阻泚水，南臨芍陂，正是有名的湖沼地帶。在湖沼地帶戰爭，水師重於步卒，步卒重於馬隊。現在，我們考察苻秦的前鋒是「步騎二十五萬」，沒有舟師；晉師則「水陸繼進」，以舟師爲先鋒。晉國的軍隊能配合地形，苻秦的馬隊遂被陷入湖沼而不能運動自由了。當時，鳩摩諫止苻堅伐東晉道：「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何必親屈體格，遠幸沮澤乎？」釋道安也勸苻堅道：「東南卑溼，沮氣易搆，皮膚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可見當時明達之士，都已看出「沮澤」之地，不適宜西北的鐵騎。苻堅要用西北的騎兵遠征湖沼地帶，硬是違反地理原則，圖逞其慾，他當然難免地理的淘汰，慘敗而歸。肥水之戰，晉師勝利的主因，我認爲是：東南的湖沼，陷溺了西北的馬蹄。

北方的馬蹄，既然踢不翻東南的湖沼；東南的湖沼，又不能倒灌北方的高原；這樣維持下去，遂「島夷」

安共爲「烏夷」，「索虜」終於爲「索虜」，由於地理的形便，演出南北朝的長期對立，造成中華民族的長期分裂。從全民族歷史看，苻秦肥水之敗，也許是中國的不幸。

## (14)

一 寒風實際會鮮卑羌胡，總因爲弟兄不睦，酒色荒淫，將他們草澤英雄的氣概逐漸消沉下去，直待鮮卑人拓跋珪新的馬隊自塞外興起，先滅北燕，然後滅夏，滅北涼，平仇池，再將黃河流域統一了。這時，偏安江南的司馬氏寶座，也讓劉裕搶去了。起自田間的皇帝，畢竟比那輩世家貴冑執務子弟有出息，有勇氣。宋武帝——劉裕歸天之後，兒子文帝嗣位，即圖謀恢復中原。遣兵調將，由淮泗入黃河，入虎牢，叩澶關，關中豪傑都已內應，當時的聲勢，不在乃父北伐之下。只有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反對道，「我步彼騎，其勢不敵」，幸而勝利，終恐無功而回。恰好，元魏方興，也有南牧之志，惟有崔浩以爲不可，向魏太武帝說：

「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涼方降，艸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道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彼若果能北來，當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

魏帝用浩之言，當春秋之際，宋師北伐的時候，不與爭鋒，待到天寒，河水凍合，然後反攻。這樣彼進此退，連兵若干年。到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四五〇年）魏帝大舉南下，衆號百萬，過彭城盱眙，直趨瓜步，縱兵四處殺掠，遇到壯丁即行斬戮，將嬰兒貫在槊上向空轉旋以爲戲。所經過的郡縣，總是燒殺乾淨，以至來春燕子歸來尋不着舊宅而在林木上築巢，這樣慘酷的屠殺，開了千古未有之奇。所幸魏國的步騎，不勝饒湯勞勩，或死於戰爭，或死於疾病，損失了一大半，太武帝有點膽怯，不敢渡江，便回師了。回到平城的明年（公元四五一年）被他的部下殺了，應了江南的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但是，劉宋經此猛烈的摧

殘，四野蕭條，國家空虛，從此，也無力再事北伐了。

(15)

自從永嘉亂後，北方的馬隊受了地理的限制，不能長驅直入征服江南，那從秦泰和魏太武帝兩次的失敗可以證明了。可是，南方步步要想往北進攻，也是屢戰屢敗，如桓溫劉裕雖然克復長安終不能確實佔有其地的緣因，正如崔浩批評劉裕估領長安說：「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網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敵寇之資耳。」江南的政治又不能統制關中的雍胡，長此南北對峙下去，我們中華民族，在地理環境支配之下，已臨到永久分裂的嚴重關頭。我們民族終歸於「分久必合」者，其關鍵全在魏孝文帝的遷都洛陽「用夏變夷」的最大決策。

元魏自漢朔起家，不勝風沙苦寒，初步遷都平城。平城，還是「六月雨雪風沙常起」，比漢朝的氣候好不了多少；而且距離江淮太遠，也不便於南征。孝文帝認為要統一中國，必先遷都。他嘗謀諸任城王澄說：「國家與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對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可是，一般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游牧人過慣了氈幕酪飲的生活，當然戀戀故土，也不樂於盡望南行。當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秋雨縣縣的時期，終藉着南征的理由，舉國南下，定期維也。第二年，又詔「禁士民胡服」，甚至於禁止鮮卑語，這更激起胡野人士的反對了！孝文帝仍然不顧一切的施行，並且說：

「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不容可  
弊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

這樣用夏變夷的禁幹，比較趙武靈王用夷變夏，胡服騎射的辦法，更加澈底！可是，武靈王變法是將趙國變成

馬上的國家，立刻驅逐了北狄；孝文帝變法則將馬上的魏國變成禮義之邦，反將國家變衰弱了！這是令人想不到的。然而賴此變法，改門姓爲漢姓，並且設立國子太學，四門設小學，積極的提倡教育，將我們民族舊有的學術思想灌輸到鮮卑人腦海裏，使鮮卑人忘其爲鮮卑人。從此盤據在黃河流域的雜胡，在國家積極的教育政策下，受了中華民族學術思想的薰陶，也漸變革其獷悍的本性了。不幸，北魏後來分爲東西兩國；東魏爲北齊高歡所篡，西魏爲北周宇文泰所篡，大體說來，還是鮮卑人的天下。後來，北齊併於北周。北周魏的復古，欲以周官治天下，就是直接接受魏孝文帝用夏變夷的影響。北周復古，雖然是畫虎不成；但，附文帝終於憑藉宇文泰「關中本位」的基礎，滅了南朝，將三百餘年來由種族界限釀成國家分裂的局面，卒歸於統一；並且綜合黃河流域的雜胡重新鑄成一個大中華民族。我們今日，與其歌頌附文帝的文治武功，不如歸功魏孝文帝用夏變夷的一貫政策。這個政策，是要從根本上消滅種族的界限，而納民族文化於一元，從我們中華民族全史看，其功不在漢武帝經營四方之下。

## (16)

陳叔寶狃於「長江天堑，古以爲限隔南北」，認爲北方馬除決不能飛渡的。所以放心大膽的縱情享樂，正如附文帝討伐詔書所謂「規秦閭閻，資產俱竭，窮奢極侈，俾晝作夜，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綺羅而呼騶騶」，招集一羣無品的人文和妃嬪們混在一起，創作那類臨春樂、玉樹後庭花亡國的音樂。誰知附文帝派了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韓擒虎爲和州總管，老早將建康的北門看守好了。附朝又利用天時地利，從事游擊戰，如高顯的建議：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必解甲。再三若此，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

「又，江南土薄，含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產；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

隋朝實行了這兩種游辣的游擊戰術，以破壞江南的經濟基礎，不到幾年工夫，陳國便失掉地理的優越感，而漸趨崩潰了。文帝開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陷軍水陸並進，在陳國守采石要塞的軍隊爛醉不醒的夜裏，韓擒虎便率領五百人自橫江偷渡，而直趨朱雀航。同時，賀若弼也自廣陵飛渡天塹，直趨鍾山，入臺城。這時，陳叔寶無路可逃，只得攜着心愛的張貴妃孔貴嬪躲到景陽井裏避難。結果，讓韓擒虎完全活捉。陳國亡了，中國又歸大隋一統了，正應了郭璞「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興中國合」的預言。現在，可以說：隋朝之亡，由於政事不修，反爲優勢地形所誤。

(17)

沒有秦始皇的大一統，不會有兩漢盛世；沒有隋文帝的大一統，也不會產生唐太宗一流大皇帝。所以隋文帝的文治武功，也值得我們深刻的回念。

文帝深知「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對於散居中原的雜胡，總派賢明的官吏去經撫，所以胡人都樂爲之用。尤其對於各州刺史以及各縣縣令，特別的注重賢才，凡是有治績異政的地方親民之官，總是賞賜甚厚；或者懸書褒獎，以昭告天下。小到縣令，只要他有優異的政績，皇帝時常召到榻前，訪問治民之道，予以不次的陞遷。皇帝說，道班好長官，「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之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這樣的獎勵良吏以安輯百姓，當然天下會家給人足日見昇平了。獨狐皇后甚至感道班長仁犯了法，應當處死刑，文帝爲了皇后的關係想免長仁的死罪。獨狐皇后說：「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終於依法辦了。皇親國戚與庶民同罪，當時的官吏，當然是人人奉公守法，不敢營私舞弊，立成開

皇之治。國內安定了，於是討伐突厥。當開皇二十年（公元五九九年）突厥啓民可汗上表陳謝，隋兵幫助他擒獲達頭可汗道：「大隋聖人可汗憐愛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當爲大隋典羊馬也。」塞外的突厥族，也馴服於大隋威力之下了。

## (18)

文帝安定了中國，時間不久，兒子煬帝即位。這位皇帝，一方面是荒淫酒色，一方面是好大喜功，鬧得山窮水盡，民不聊生，像賈文舉所公佈的罪狀，「陛下燒棄宗廟，巡遊不息，外窮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那是字字真實，絲毫不謬；所以他的好頭頸，終讓他所親信的臣子文化及斫了。因爲他也是亡國之君，後人歡喜拿他比秦二世，那就錯了。煬帝伐高麗，雖然勞師無功，但他能奴使啓民可汗；滅吐谷渾，親巡張掖，朝見西域二十七國，因置郡縣，且末、河源、西海諸郡於今新疆青海區域，使西域疆土重歸版圖，對於我們的民族不無微功。他，即位之初（公元六〇五）。

「徵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渠，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當今二十四丈），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大業四年（公元六〇八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那）。

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便可通龍舟。」  
永濟河，專爲軍運而鑿，固然值得我們贊許。通濟河和江南河，當時雖然專供巡幸之用，但是唐宋以來，就利

用道運運河，運江南之穀，濟中原之饑，成爲南北水運交通的主幹。將三道運河連貫起來，可以自涿州泛舟南下直達浙江，溝通了黃河長江，正式征服了地理上自然的南北障礙，較之秦始皇馳道，更爲偉大，更爲永久。從此，我們的國家縱有暫時分裂，我們的民族與文化，不再有何南北的隔膜。從我們全民歷史看，隋煬帝的運河工程是很偉大，對於中華民族的貢獻更其偉大！

(19)

馬，畢竟是我們民族復興的主力。當唐高祖在晉陽起義的時候，明知「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因爲缺乏我馬，不能不連結突厥。太宗以萬世之雄，「降李密於黎陽，俘竇建德於河北，爲王世充於東都，艾劉武周於并州，剪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果於涇水」，六年之間，身經百戰，以武力恢復中原一統，如此的艱難。即位以後，總防着隋朝的覆轍，時時刻刻檢討自己的政治得失。有一天，太宗問房玄齡：隋文帝政治如何？玄齡說：「文帝勤於爲治，亦勵精之主也。」太宗則謂：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昭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闕白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他明白「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稍有不昭，就會發生「下諫上蔽」的流弊。所以他任用官吏的標準，不論關係的親疏新舊，但問賢與不肖。他自秦王龍飛之後，秦府的舊屬多未升官，而反任從前與他敵對的魏徵之流，當時秦府舊人多少有黯不平，請房玄齡來試探太宗的意思。太宗曰：

「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

擇賢才而用之，豈能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懇摯，豈爲政之體乎！」

當時秦府舊兵想攀龍附鳳，迫隨到皇宮當宿衛，也遭太宗嚴厲的申斥，不敢申求了。

高祖卽位之初，很想加強宗室的組織以拱衛宮室，大量的封建子弟，雖三尺童子也都叨光封王了。到了太宗時候，將那些無功而王的同姓一律降爲縣公，他說：

「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

不以皇帝的懿親，濫費百姓的脂膏；對於那班吮民膏血食粟無厭的官吏，當然是加以嚴厲的制裁。魏弘仁以開國的勳勞，出爲廣州都督，罷官歸來，有人告他貪贓百餘萬，太宗立刻置他於法。太宗深知道「與我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的要道，所以將當時所有都督刺史的名字記在屏風上坐臥觀之，他們在官的政績優劣，隨時注在各人名字之下，以備黜陟的參考。同時，命令五品以上的大官慎選縣令，因爲縣令是親民之官，不能不更加慎重。後來，有點馬虎了。馬周上疏道：

「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京官不稱職者放出去做親民的官，民事最繁，官更不會稱職了。治軍與治民，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用武人爲親民之官，不失之猛烈，便失於跋扈，只適宜兵荒馬亂的時期，非治平時代所宜有。太宗自己曾經說過：「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而貞觀之治，還不免武人爲刺史，大概是受征服四夷的影響。我們試看京畿之內有蝗災，太宗就捉了幾隻蝗蝻吞下去，說：「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將食吾之肺腸！」

太宗的本心是決不忍用那羣不稱職的武人去啄百姓肺腸的。

治國的根本在法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法令固然要隨時修改，若

是朝令夕改，那會發生極大的流弊。太宗有見於此，嘗語誠大臣道：

「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更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他隨時注意行政的人選，又特別注重法令的流弊，能够人事與制度並重；所以貞觀之治，成爲中華民族史上千古未有之盛！太宗所以能成此盛業者，他自己也曾經檢討過說：

「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主往往見賢則欲置懷，退不肯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肯者則憐之，賢不肯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責中弊，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這五件事，考其平生，絕不誇張。太宗人格的偉大，在「愛夷狄如中華」方面更表現得「以天下爲家」，不愧人類之王！

(20)

突厥趁著我們人類之王全力削平內亂無暇北顧的時候，東併契丹、室韋，西伏吐谷渾、高昌，聲勢浩大，一躍爲亞洲的主宰者。他自恃其士馬之盛而又有援助唐高祖之功，很驕傲的對待高祖；就是使臣到長安，態度也很橫暴，國家總是容忍著。突厥是貪婪無厭的，看見唐朝著著的退讓，認爲懦弱可欺，動輒精騎數十萬擄掠長城地帶。高祖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突厥的頡利、突利兩可汗連騎十餘萬入寇，進攻到武功，長安戒嚴了。這時，高祖年壯，沒有精力對付這羣鐵騎，便傳位給太宗。太宗在這個緊急的局勢下，帶了幾位大臣，輕騎到渭橋，與頡利隔水相談，責以負約之罪。突厥人不料皇帝會挺身而出，教訓他們的可汗，都拜倒在馬

前。不久，國軍趕到了，真是旌旗蔽野，甲冑耀日，更駭得突厥人不知所措手足，頡利可汗只得請和退師。當時的朝臣，都主張背城一戰。太宗說：「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明年，塞外大雪，突厥的羊馬凍死了大半。羣臣認爲「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現在，突厥，民飢者搜，正是天亡的朕兆，都勸太宗乘機將突厥剿滅，以根絕國家的外禍。太宗則謂：「新與人盟而背之，不啻；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這種「以德報怨」的精神，不但秦皇漢武對之有愧色，就是亞力山大亦破命也都望塵莫及的。

突厥的部屬，薛延陀、回紇、奚、黠、契丹、靺鞨、拔野古、僕骨、同羅等，不勝頡利可汗的虐待，一個個叛變而向大唐投降了。頡利還是表面上向太宗請和，暗中唆使我們民族的叛逆染師都擁護邊鄙，這纔激起太宗的盛怒，遣兵調將，大舉出征。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一舉而擊潰突厥於陰山，頡利頡利可汗被俘。從此，大唐的疆土拓展到漠上，突厥人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吹北門」。太宗對於四裔，一貫的政策，是：「叛而執之，服而封之」，絕不許將士們屠殺降俘的。突厥投降了，太宗便在滑長城地帶添設十州以處之，並令頡利爲順州都督，仍舊統率他的部衆。太宗背戒突利道，「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憐於爾父叛附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中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他們願意遷居中國內地的一萬多家，太宗便將他們安置在長安。誰知道羣梗頭的傢伙，在長安舒服久了，反而圖謀暗殺太宗。太宗纔回念魏微的名言，「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今降衆十萬，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心腹之疾」，令十萬多突厥，渡河出塞，還其舊居。

誰知，突厥覆亡了，薛延陀就乘虛而入，佔有突厥的舊地。敗兵之將，不敢言勇，太宗命令突厥還舊地，他們反而懼怕薛延陀，不敢出塞。太宗不得已，乃賜薛延陀禮道：

「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舊百寮，部落皆如舊百姓。中

國貨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牧畜。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爾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如其踰分，故相鈔略，我則發兵各問其罪。」

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起初奉命唯謹，到了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突然勾結回紇、靺鞨、回纥、僕骨、霫諸部發動了三十萬衆，越過沙漠，南擊突厥。突厥的部落只得退入長城，向朝廷告急。太宗立即派遣李世勣、張儉、李大亮、張士貴、李襲譽等統率步兵十餘萬，騎兵六七千人，馳往朔方去援突厥。薛延陀窺見大唐的步騎，塵埃漲天，就駭慌了，掉首北走。唐兵追到青山，縱兵橫擊，大破薛延陀。從此薛延陀一潰不振，部落爲散，不知所之；所有附和的各部落，都頓首請來朝貢。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將漠南漠北的各部落，一律改爲都督府，以其酋長爲刺史，於是北荒悉平。這羣歸化的部落，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這條尊嚴的道路，大概就是今日山河套往外蒙庫倫的大道。

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平了吐谷渾，仍封其可汗爲河源郡王。十四年，平了高昌，置安西都護府。二十三年討平西突厥置瑤池都督府。於是大唐的疆土，「東極於海，西至蔥嶺（貞觀十四年，只平高昌，未平西突厥，故舊史原文云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恢復兩漢的舊觀。只有討伐高麗，太宗未竟全功而崩，有些遺憾。然而，從他的遺憾裏正反映出他人格的偉大，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太宗親征高麗，白巖城主降而復叛。太宗怒極了，下令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重賞之下，士卒奮戰，城主還是投降。李世勣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太宗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子，

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背背犧牲自己的庫物，以保全敵人的生命財產，這是何等的胸襟！敵酋泉蓋蘇文特遣加尸城七百人戍守蓋牟城，城破之後，加尸城人都願爲大府效力。太宗遣他們回去道：「汝等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即蓋蘇文）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這又是何等慈仁！從這兩次「不忍」的事實考察太宗心理，他對一切戰事，決不是出於好大喜功的侵略，確爲我們民族的安全，不能不勞師遠征。這種「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胸襟擴大到夷狄身上；所以太宗身死之日，所有稽留在長安的外族皆慟哭擗面，流血灑地，甚至於被俘虜的可汗們都請殺身殉葬。從「參天可汗道」而至於「請殺身殉葬」一般事實看，我纔敢說：唐太宗，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聖君，在世界史裏也可算他爲「人類之王」。

## (21)

靠山喫山，靠水喫水，人類總歡喜依賴自然而生活，國家也總是依賴地理的保障而獨立，如高昌國王麹文泰自恃「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便樹絕中國四城的交通。並且很傲慢的對大府使臣說：「鷹飛於天，雉伏於野，貓遊於堂，鼠曠於穴，各得其所，豈能自生邪？」這幾句話激怒了太宗，派遣大軍，冒犯寒熱，渡過沙磧，卒將高昌穴鼠取出來。太宗認爲地理的優勢，並不能絕對的保障國家的安全，要想國家安全，先得安定百姓。房玄齡檢閱府庫所藏的甲兵，精於隋時，報告太宗，太宗對他說：「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安民以安國，這種精神國防論，至今還有熟讀的必要。當突厥猖狂的時候，朝臣都主張徵工修建古長城。太宗說：「突厥災異相仍，諷利不懼而修德，秦虜滋甚，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鄰塞乎？」不出三年，果然將突厥征服了。這時，太宗卻又誇揚李世勣的功績說：「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

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舉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太宗不重視那條死的長城國防線，而以名將鎮壓那南侵的沙漢。沙漢之上，遂開闢了千古未有的「摩天可汗道」；依賴沙漢爲保障的游牧者，都沾沐了「天可汗」的恩澤，警息他們種類。「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所以我們民族，與其盛稱唐太宗的武功，不如表彰他的文德。

以武功言：太宗的臨機應變，料敵如神，從他祭魏武帝文說，「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自負甚高，用不着我們再爲他揄揚。我們所爲之驚奇不置的，沙漢游牧者一向憑藉他們動力強大的鐵騎荼毒中原；我們民族也一向準備馬隊與之周旋，一旦無馬，便狼狽南逃。可是這位人類之王，卻不如此。當他晉陽起義時就患馬隊缺乏；等到他四征不庭，還是以步兵爲主去掃蕩塞外鐵騎。如，貞觀十五年討薛延陀之役，總共派步兵兵十幾萬，便掃蕩薛延陀諸部聯軍二十餘萬騎；薛延陀的三萬鐵騎迫到長城，反被我們六千個精騎殲滅了。這種以少數步兵殲滅多數騎兵的戰術，一前我們民族千年來受馬壓迫的恥辱，真是我們意想所不到。薛延陀受過大唐的教訓，也曾「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也許是想不到太宗的運用之妙，纔弄巧成拙，一敗塗地。唐太宗能够運用我們農業生產的技藝擊敗馬上爲家的沙漢游牧者，這纔是中華民族史上曠古未有的盛世！

(22)

唐高宗承繼太宗的勳業，發揚光大，在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驅逐西突厥於今伊犁河之外，分設設池罷陵兩個都督府。到了調露元年（公元六七九年）派裴行儉冊封波斯王爲「安撫大食使」，大唐的政治力量，四邊伸到地中海岸，與東羅馬帝國接壤，當時國威超越兩漢了。高麗百濟俯仗倭國的厚援，負海自固。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敗倭國援軍於白江口，焚毀倭船四百艘，燬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降

服了。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李勣拔平壤，高麗也不定了。在不壤設立安東都護府，完成太宗的遺志。終因爲「胡虜恃馬力以爲強」，大唐缺乏馬，與吐蕃戰爭，互有勝負，造成長期僵持的局勢。高宗接受太學生魏元忠的建議「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直到玄宗開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關右節度使郭知運纔能够大敗吐蕃於九曲；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朔方節度使安守謙，纔能够佔領吐蕃石堡城；然後赤嶺爲界，吐蕃纔完全降附於大唐。初唐的聲威所以無遠弗屆，而後來所以逐漸衰落的緣因，只看高宗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平倭名將劉仁軌的奏章，可以爽然了！

「臣伏觀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聞以：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感慕，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歿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紀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卽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勝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當太宗時，國家用重賞獎勵人民出征，將吏也珍愛士卒如家人子弟，所以百姓都自告奮勇，人人願爲國家效死去殺敵。高宗生長深宮，不大知道民間疾苦，不善撫循將士，百姓立刻行錢參逐逃避兵役了。「民爲邦本，本固邦興」；所以有國之君，一定要先安定國內的百姓，然後纔能够發揮民衆的力量以禦外侮。不能安定百姓，珍護士卒，一味的向外發展，縱然不陷隋煬帝及身而滅的覆轍；我們民族的力量，在「枷鎖推禁」，「州縣追呼」之下，自然的粉碎無餘，國家終有毀滅之憂。劉仁軌的奏議，正道破了我們民族一盛一衰的內在原因，很值得研究民族史者長思。

日盈則昃，盛極則衰，唐高宗的晚年，爲武后所惑，用人行政不免差錯了。繼之以武后稱制，韋后干政，國家的一切日趨凌亂。縱有玄宗開元的中興，也挽回不住大唐的頹運。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遠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使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不逾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遠領矣。蓋嘉靈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安祿山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通鑑唐玄宗紀、天寶六載文）

在小人專寵固位的企圖下，一班品德純備，才勇俱全的賢材，便浮沈下僚，不會出頭了。於是，有品德者便甘心澹泊，退隱山林；有智勇者或挺而走險，作亂犯上；所有的內亂，多數是由專寵固位的小人造成的。何況李林甫之流，專用桀驁難馴的塞胡替代邊疆的重臣，甘將自家的國防鎖鑰交給降敵，國家焉得而不衰亂啊！

由於河北三鎮的叛變，引起中原藩鎮普遍的割據；由於內亂的頻仍，引起了突厥、回紇、契丹、吐蕃、南詔諸族此服彼叛，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下，大唐帝國終於積弱不返而亡於盜賊之手。朱溫、李存勖、石敬瑭、劉彧、郭威互相篡奪，造成五代的混亂。五代之中李存勖出於四突厥，石敬瑭出於四夷，劉彧出於沙陀，都以外族入據大位，已樹遼金割據的先聲。這時，契丹的阿保機已崛起東北，初尙請求後梁的冊封，又和李克用約爲兄弟。後來，屢寇河北，與後唐爲敵。等到石敬瑭稱晉帝，翻而請求契丹冊封；劉彧稱漢帝，除了請求

冊封之外，更向遼世宗稱「皇帝」，我們內亂愈烈，比於夷狄之君愈卑；這羣卑鄙無恥的皇帝，真是丟盡我們民族臉面。回想唐太宗時代，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賜其酋長姓李，天寶年間，賜契丹阻午可汗名爲李懷秀，不到二百年工夫我們國家的命運衰落至此；我們民族的意志也如此頹唐；更不能不令人痛自反省。

契丹，本是鮮卑族的一部，不勝螞蟥、突厥的壓迫，常輾轉於遼水流域，游牧爲生。自天寶十載（公元七二二年）大敗安祿山於潢水，逐漸強盛起來。數傳至勻德實，教民稼穡，撤刺的開墾冶鐵，開始農戰政策，契丹格外的富強。同時，大唐帝國所賴以鎮懾東北的平盧、盧龍、魏博三鎮，安史亂後，繼之以田弘正、李師道、王庭湊、何進滔、劉仁恭等，彼滅此興，覆亂相尋，坐令契丹強大而不顧。當時所賴以隔絕胡騎往來的唯有榆關（今山海關）。守榆關的士兵，向皆自耕自食，收穫之後，即墾墾清野以待契丹。契丹的馬隊即使進犯判榆關，那裏，無糧可資，無畜可掠，只得狼狽而走。後梁貞明三年（公元九一七年），盧龍節度使周德威自恃勇武，不修邊備，拱手而失榆關之險，從此，河北三鎮與契丹共之。宋太祖受將士的擁戴做了大宋皇帝，承襲五代的政治基礎，仍都汴梁，又承繼後周的「殿前諸班」擴充爲國家的中心武力，次第削平大江以南的割據羣雄，很勉強的恢復中華一統。因爲討伐契丹所卵翼的北漢，開罪了契丹，契丹便乘隙南收，漸奪有燕雲十六州了。宋太宗既滅北漢，很想乘勝收復幽薊，當時勇將如：號爲「無敵」的楊業，號爲「黑面大王」的尹繼倫，都是契丹人所懼怕的。不幸，外有護軍王旻要爭戰功，犧牲了楊無敵；內有重臣趙普、李昉、宋琪之流都一致主張保境安民；在國家不信任大將，大將有功就要調任的一貫作風之下，燕雲十六州遂永遠的可望而不可即了！

(24)

宋太祖自「殿前都點檢」受周之禪，時時刻刻就提防他的殿前禁衛軍重演那套「黃袍加身」的喜劇，首先收回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的兵權。又爲於前朝藩鎮有專軍、民、財、法諸權，往往背叛國家，割據稱王，乃改用

文人知各州軍民之事，設「通判」去直接統治；又設轉運使掌管各州的財賦，直接系屬中央，使藩鎮不能截留財賦以養兵；於是地方的民、財、法之權完全集中於中央了。尤其軍權的集中，最爲徹底。各鎮只有廂兵，廂兵的壯健者選送都下，升補禁軍。禁軍，初皆列營於京畿，以鎮壓四方；四方有事，則遣禁軍出征，而臨時置將帥統率之；這就是宋儒所自謂爲：「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的最完美的兵制。因爲「兵無常帥」，結果就「將不知兵」；以將和兵不關痛癢的禁軍與契丹的「部族兵」決戰，當然是成功少而失敗多。因爲對外戰爭屢次失敗，而擴禁軍的名額，由六十萬常備兵擴充到一百二十五萬，結果，傾全國的財賦以養兵，兵還是食不飽，衣不暖；而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天下之兵反不堪一戰。正如葉適所謂：「養兵以自用，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說到宋朝的政治，更令人喪氣。自太祖獎勵功臣，「多積金錢，厚自娛樂；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當然是朝野上下，食厚成風。差役制度，爲宋朝病民窳國之首。神宗時，王安石當權，改爲「保役法」，小百姓歡喜極了，當時的重臣文彥博則以「祖宗法則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爲理由，反對黃力。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說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對皇帝說：「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所謂一代名臣，也只知道縱容官吏貪污爲立國之本，民生何從而得安呵？魏徵箴戒唐太宗說得好：「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貞觀之治，以安民爲本；而宋朝政治不惜擾民以養官，利用貪官鞏固皇權；皇權越鞏固，百姓越痛苦；我們民族的力量，在那羣貪官污吏敲剝之下，化爲雲煙了。南宋高宗嘉定八年（公元一二一五）大儒真德秀上疏，曾經檢討過北宋亡國的十大根源，很值得我們玩味，現在擇要鈔錄於下：

「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宜（政和宜和、皆徽宗年號），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以逞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規選我二聖（徽欽二帝），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宜致禍之由，其失有十……：自童貫高球，造

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釋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政宜之際，以官爲辭，張根論征敵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荐紳不敢言矣。鄧庸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倡言官寺，竄置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銓績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宜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爲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折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政宜之世，京黜繼尸宰柄，下攸激則樞庭；其期翔台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卽齊梁子弟，非奴事閹尹，卽翼附權臣，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和小人，顛爲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歸咎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渡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旣」，政宜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勛以資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鑿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爲盜賊；雖微盜賊，亦必有齷齪之憂，其失八也。……有國者不幸與強國爲鄰，常有以服其心而不能徇其欲。昔女真絕遼國交，雖每戰必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違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錢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蹙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賢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

真氏接下來檢討南宋的政治失策，道：

「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般樂怠傲，乃有宜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七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聲；兇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視；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匪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詭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這種讜直的言論，非有唐太宗的雅量 and 識見，任何庸主所不能誠意接受的。可憐南宋，就在功勳重臣掩護貪墨，奸雄小人排斥忠直，上下相蒙，苟全各人自己富貴之下，初臣於遼，再臣於金，終亡於蒙古的馬隊。

若從地理方面考察北宋首都——汴梁，這塊四戰之地，只有河流的交通，而無高山的保障，自古適宜車戰的。毀軍崇卒以後，騎兵便成爲戰爭的主力。契丹女真之起，都是以馬隊爲主。契丹的正軍，每名有馬三匹，附帶打艸穀、守營舖的家丁各一人。人馬不給糧艸，日遣打艸穀的家丁騎出去四面鈔掠，以供糧艸，出征的時候總是因資於敵。「女真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本來也是以馬上爲家的部族。契丹人嘗說：「女真兵滿街，則不可敵」，他們勇敢善戰又過於契丹。契丹的馬隊縱橫於河朔，而「皇皇鎮宋」，都於滹濟之間，向不產馬的區域，唯有「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敏捷如神」的匹夫之勇。每逢契丹來使，太宗就示以劍舞；太宗出征，也以劍舞爲前導。「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大宋的劍舞，當然敵不過契丹鐵騎。太宗不知道澈底改革大宋帝國的軍事和政治，異想天開賜渤海國王留贊道：「遼遼之日，幽劍士宇復歸中國，朔漢以外悉歸渤海。」誰知渤海國置之不理，而契丹人却扶植鮮卑人李繼遷在夏州成立了西夏王國，以擾亂大宋帝國的西北邊疆。從此河套以南，涇渭以北，中國人也不得安枕了。女真既盛，徽宗遣馬政浮海通好，約夾攻遼。遼遼之後，「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徽宗又使馬政報書云，「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誰知宋兵不中用，入燕京省還是金兵。金人得了加倍的歲幣，將燕雲七個空城交給宋國，宋人便觀顏相賀收復燕雲了！金人看透了宋朝是：小人得勢，內政不修；驕奢淫佚，府庫空虛；遼遼之後，就想

乘勢取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一二二五年）金人要求宋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剛剛冊封的廣陽郡王童貫得到這個消息，便屁滾尿流的駭回汴梁。朝廷方在會而不議，議而不決的時候，女真的人馬已一路取太原，一路渡河圍汴京，大宋的軍隊見敵旗而奔，聞鼓聲而潰，真如摧枯拉朽，毫無戰鬥的意志。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不能驅走六萬個金兵，兵多而不精，或精而不得其將，遂促進北宋的滅亡。當徽欽二帝被俘時，只有李若水罵敵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這大概由於國家平日不以國防爲事，而專門信任小人格擊君子，敵剝百姓的惡果。

## (25)

靖康之難（公元一二二六年），是中華民族第二度的大衰敗時期。金兵所至，一匪守士有責的長官，降的降，走的走，能够與城共存亡者百無一二，推其原因，不外開國的規模，重文輕武，專以文人出典州鎮的毛病，內政上確已防制藩鎮的割據，國防上遂不能抵禦外寇的進攻。即使時勢造英雄，以外寇壓力下產生一兩位文事武備兼而有之的傑出人材，拚了幾次命，打了幾個勝仗，政府防止他精兵在握，將成尾大不掉，還是用祖宗薪傳，立刻的或選調，或罷免，代以不知兵的奴才。寧使恢復之功，終虧一篑，決不讓謀臣猛將，一守亡國之恥；寧做「兒皇帝」，比於敵人的藩臣無恥去求和，決不許忠臣義士有何恢復中原的企圖。李綱之貶，宗澤之死，岳飛之殺，韓世忠之罷，這班民族英雄，終在宋高宗苟全帝位，不管民族存亡的無恥心理下犧牲了。汪伯彥、黃潛善、呂頤浩、秦檜之流，善於逢迎高宗苟全帝位的心理，一個個譏寄忠良，獲得無恥皇帝的降龍，坐將精兵他馬所在的西北，委棄給敵國。高宗帶着這羣奸賊投奔臨安，滿以爲「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長江天堑可以保障他們的安全。「我能往，寇亦能往」，誰知金兀朮貪得無厭，還是領着大隊人馬，飛渡天塹，窮追到浙江。這輩善於苟全的君臣，只得抱頭鼠竄，逃往溫州。幸有岳飛屢敗敵騎於廣德，韓世忠以八千

之蒙控制金兀朮十萬大兵於江南，使他欲歸不能。駭得金兀朮乞命告饒。金兀朮纔知道「南軍使船如使馬」，北方的馬隊家奔狼突到江南，受船的控制，無所施其勇。金人受了地理的嚴厲教訓，從此不敢輕於渡江；宋朝的皇位，就在地理的保護下，又苟延殘喘一百多年。

汴京的淪陷，金人大量的「扞括」，共括去黃金三十七萬八千兩，白金七百十四萬兩，衣緞一百零四萬匹，北宋多年的蓄積，讓金人搜括一空。這些損失還是小事。「凡法繩、齒簿、齒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璽、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有關國家學術文化的一切寶物，都讓金人囊括而去。這雖勝於焚毀一籌，可是，這些國家文化之寶，終於金亡之時，爲蒙古馬隊焚毀於中都，這種有關民族文化的損失，不可以價值計了。而宋高宗在一羣忠於他個人而不顧民族國家的小人擁護之下，甚至不共戴天之仇，也容忍不報；儘管他皇位保全，千載之下，我們要論定他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秦檜之後，纓之以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一串奸佞當國，譏害賢良，縱有命世之才如俞允文、陳亮也無能爲力恢復中原。一直等到蒙古馬隊自韓離河起來掃蕩了女真的塞外根據地，進而佔幽燕，金人也倉皇渡河，遷都汴京。宋人又想到利用這支外力收復河南之地。理宗紹定五年（公元一二三三年），派史嵩之去報蒙古的聘，並且訂立夾攻的同盟。金哀宗得到消息，便派阿虎帶討宋緩兵。哀宗面諭阿虎帶道：

「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生事，均切責之，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爲贈，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滑口臨陣，生獲數千，悉即資遣。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唐州，彼爲謀亦淺矣！元滅國四十，以及四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昏亡商寒，自然之理。若與連和，爲我，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曉之。」

這種懇切的哀求，打不動宋帝的復仇心理。還是派孟珙會元帥於蔡州，將大金帝國滅掉。「多行不義必自斃」，

回想粘沒喝入汴京，蹂躪大宋君臣，無所不用其極；兀朮采石渡江，縱火焚燒臨安那類窮鬼極惡的行爲，也該有如此慘痛的下場。可是，金滅之後，與元爲鄰，局勢的嚴重，正如洪咨夔所謂「抱虎枕蛟，事變叵測」；而南宋的君臣，依然是醉生夢死的希望收復三京。當時，喬行簡就痛陳復興的道路，必先求內政安定說：

「……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然後治外。陛下觀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媮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複草，禁食曷之令，而州縣仍贖貨，不知強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廢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關乾坤，混一寰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善意乎？」

因爲官吏中飽，國家入不敷出，而加發楮鈔；因爲楮鈔膨漲，物價上升，而官吏更加贖貨；民生不能安定，國家綱紀更形紊亂，不待蒙古鐵騎，入巴蜀，取襄陽，據江漢上游以臨江東，南宋的國運早已危乎殆哉！可憐大宋的江山，終於祥興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年）隨帝昺沉於南海，我們的民族忠臣，張世傑，陸秀夫當時以身殉國，文天祥從容就義於柴市，謝枋也得餓死側忠寺，都爲我們中華民族光大了堅貞不拔的人格，更用我們民族的血和淚寫下一篇正氣歌，供我們民族永遠的追思，永遠的警惕！

## (26)

提到蒙古馬隊，我相信東歐人至今猶有餘悸！「世界侵略者」成吉思汗，以七十二匹驕馬起家於斡難河，次第蕩平漠北諸部族，在公元一二一九年（太祖卽位十四年，元祕史所謂兔兒年），親征花剌子模（Khorazm）。明年，入斡脫羅兒城（Otrar）。明年，克卜哈兒（Bokhara）、薛迷思干（Sameskand）諸城。在……

二年的冬天，大掠折都（Kingdom）的北部。明年，避暑於八魯灣（Pernan），收不了西域的南疆，置陸魯花赤於各城以監治之。西域定了，又命速不台和哲別各將萬騎，窮追逃寇蘇爾灘，至乃沙不耳（Nishabur）城，降服了木剌突部（Mahlida），大軍進到裏海之南了。奇卜察克倚仗高喀斯山（Georgia）的天險，也收容西域的逃人，於是哲別和速不台兩支大軍，繞過裏海西岸，直趨打耳麻闕（Larband），鑿山通道，殺入阿蘭部，又大敗阿蘭奇卜察克聯軍。奇卜察克酋長魯灘乞援於赫羅思（Rusa）國。赫羅思集合其諸藩八萬二千大兵，分爲南北兩路防止蒙古馬隊北上。一二二三年，蒙古又大敗赫羅思聯軍於阿里河兩岸孩兒梁之地；乘勝攻至扯耳尼哥城（Chernigov），俘虜了扯耳尼哥計掖市（Kievo）諸部名王六人，諸侯七十人，殲滅赫羅思大兵十分之九；於是黑海以北的土地，都歸蒙古掌據了。成吉思汗就封他的大太子朮赤於奇卜察克、阿蘭、赫羅思之地，是爲欽察汗國（Sarai）。

(27)

成吉思汗死了，窩闊台嗣位，欽察汗國屬部時常叛亂。窩闊台乃命朮赤的次子拔都統率大軍，第二度西征。一二三七年，蒙古馬隊就平定裏海以北各地，踏進赫羅思的國土。當年的隆冬，踏著冰雪，就攻下烈也贊（Riazan）和克羅姆訥二城，繼續進佔了莫斯科（Moscow）。明年春天，攻佔了赫羅思首都物拉的米爾（Vladimir），其王攸利第二戰死了。拔都分兵爲二，一軍北進向那懷鄂羅特（Novgorod），距城百餘里，爲泥濘所阻，不會達到波羅的海岸就回師了。另一支馬隊則由計掖市西進，窮追奇卜察克的逃民和酋長康灘，康灘遂逃入波蘭。一二四〇年的冬天，拔都跟着進兵波蘭，佔領其北邊大城柳勃林（Lublin），趁着堅冰渡過斯拉河，又佔領了克拉克（Cracow）城。明年春天，大敗波蘭日耳曼聯軍於勒基道赤城（Legnitz）西南的瓦而司達（Walsart）地方，蒙古馬隊已踏入普魯士疆土了。因爲馬扎兒（Magjars）國和波蘭聲氣相

通，要征服波蘭也得進攻馬扎兒，拔都遂令進攻日耳曼的大軍南移到格蘭會師。另一支人馬則由計拔市，出哈力赤（Galich），穿過喀而巴特山要隘，而入派斯特城（Pest）。這座城在杜懶河（Donau）東岸，與馬扎兒首都格蘭（Gnan）隔河相望。拔都在未進軍格蘭之前，曾派英吉利人去招馬扎兒王貝拉歸順。貝拉不睬，也不設防。等到蒙古馬隊，踏着杜懶河堅冰攻到格蘭城下，貝拉就攜着妻孥向南逃入地中海。蒙古馬隊追蹤而至阿格拉姆城（Agram），並且大掠塞而維亞國的耳拉孤薩城（Ragusa），直至維尼斯（Venice）國界，幾乎掩有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半島。蒙古馬隊踏遍東歐了！這個時候，貝拉纔乞援於日耳曼王，又以普魯西歐及英吉利諸國云，「若塔塔兒（按即韃靼）來，我兵不能禦，則各國皆危，不能保。請併力敵之。」正在這位名副其實的拔都大將（按，蒙古語拔都，清語為巴圖魯，勇敢無敵之意也。）遠征歐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時候，恰逢窩闊台之喪，蒙古內部發生了帝位繼承問題，不得不班師東歸，結束遠征的大業。不然，蒙古的馬蹄，不踏踐到英倫海峽是不會停止的。

## (28)

現在，我們檢討蒙古馬隊所以橫行亞歐的緣因，首先我要指出冰天雪地的環境鍛鍊出他們艱苦卓絕的精神；加上他們以游牧為生，喫的是牛羊肉，飲的是馬奶，又營養成健康的體格。以這種健康的體格，卓絕的精神，當然容易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他們自幼訓練的騎射技術更是驚人，如黑韃事略所稱：

「孩時，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跣立而不坐，故力在附著八九，而在僻者一二，疾如颯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鞞而已。」

「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札。」

以這種精練的騎兵猛撲我們生長田間不習戎馬的農村社會，當然是望風潰逃了。自成吉思汗混一漠北，道羣馬隊，從戰爭中鍛鍊成一種驚人的戰術，是：

「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裏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攔擊陷陣，全藉前鋒，枉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旋聚，爲敵所包。大軍少宜整而騎宜分，敵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雷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箭之所指；其分而合，聽姑澗之聲以爲號，自遠而近，俄頃千里。……」（黑糖事略）

以這種分合不定，來去飄忽的鴉兵從事野戰，當然戰無不勝。遇到深溝堅壘的城堡，用鵝洞砲去攻擊，又是攻無不破。當蒙古馬隊向幽燕進踏時，徒單鎔上書金帝說：「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金人也是以馬隊起家滅遼和北宋的，可是，踏進長城之後，受着地理的支配，逐漸農業化；他們的馬隊也逐漸密化；就不能勝道新興馬隊的突擊。那時，葱嶺以西的國家，或農或商，保留古代封建的遺制，一班城主，不能聯合，彼散而守，當然更抵不住蒙古馬隊的聚而攻。有史以來，馬的動力能够發揮盡致的斷推蒙古人；所以成吉思汗的武功，遠遠駕漢武帝唐太宗而上之。何也？漢武唐宗，均憑耕牛的動力鎔征沙漠，顛覆的牛步，當然趕不上馬力活動範圍之廣，成吉思汗所以能橫行歐亞，稱爲「世界侵略者」，馬之力也。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蒙古馬隊所過，往往的民無噍類，城郭爲墟。有時爲搜括到死屍的珍寶財玩，破其腹，滿其腸，種種的殘暴行爲，至今東歐人猶是談虎色變。滅宋之後，公開的發掘先帝的陵寢，拋屍露骨，以求珍玩，凡是隨過詢問西黨傷突犯冬清引諸作者，也都不會忘記那亡國之災，災及枯骨吧！「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無去處」。韃靼馬隊，硬是將中亞人趕到東歐，東歐人趕到大西洋海岸；

在東亞，則契丹女真被趕到黃河以南，江淮之間的居民被趕到南海；整個世界被趕得安身無處，鴛犬不寧。世界文化，直接爲蒙古馬隊所摧毀者當然不可以數計。然而，不經「世界侵略者」的蹂躪，歐洲的大小城主，不會覺悟而團結成近代國家；不經蒙古馬隊的遠征，東亞人所發明的火藥和印刷術，也不會傳播到歐洲，促進西洋文明的發達。

## (29)

元代，繼承遼金的帝業，以燕京爲大都，——今北平。北平附近出產的米糧，不足維持世界之百萬以上的人羣生活。取江南之糧，以給大都之食，這是國家經濟必然的結果。初期的南糧北運，是「自浙西，涉江，入淮，逆黃河，至中梁，改由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至京師」，所費甚鉅，所獲甚微。常宋之滅，伯顏採納海盜朱清瑄的建議，開關海運，自平江的劉家港泛海，直入渤海灣內的界河，如遇季候風，不過旬日，江南之糧即可運達大都了。不幸，風信失時，吞舟有浪，大隊的海舶，也許全部葬身魚腹，運費雖省，危險實多。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九年），又採納壽張縣尹韓仲暉的建議，開會通河，「起項城縣 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所謂「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短短的二百五十里的運糧河，正式溝通了天南地北的阻隔。從此，全國的政治中心，由江河流域移到時與中原分裂的幽燕。自古多事的幽燕，反造成全國行政中樞者七百多年，不再有南北分裂之患。會通河，實融會中華民族之母，溝通南北經濟之門；這是我們民族混合的一大樞紐，不徒有經濟的價值。

但是，元代所給我們不可磨滅的印象，第一是種族階級；第二是社會階級。類其無敵的馬隊，掃蕩歐亞的列國，蒙古人一躍而爲世界主人，所有的蒙古人當然成爲統治階級，這是無可非議的。中亞以西，最早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各族，他們善於經營，有裨於國家的財富，這類「色目人」，也值得貴族的重視。惟有契丹 女

眞亡國之後，號爲「漢人」；南宋的遺民，號爲「南人」，那是最卑賤的。漢人、南人，不許担任政府的高級長官，猶是餘事。最可憐的是將成千成百的「南人」，以俘虜的方式，分賜給蒙古貴族家庭當奴婢，成羣的放逐到漠北冰天雪地之中，種子充飢，斤麻禦寒，不餓死也會活活的凍死。一息尚存，總在鞭策淫威之下，「爲公子裘」，「爲公子裘」。這些從事生產的勞工，當時的社會階級還屬中等，等而下之，乃是儒丐，如心史大義略敘所謂，「糖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從文化落後者那套功利主義的生意眼看，官吏高於僧道者，謂其有益於國也，這還是皮相之談。成吉思汗曾奉四藏高僧八思巴爲帝師，又卑禮厚幣以迎長春真人至印度行宮，多少可以反映出僧道之徒的社會階級，實高出官吏之上。他所以陽尊僧道於官吏之上者，當然不脫原始神道設教的意味。謝枋得所謂，「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七匠，八娼。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登山集，送方伯載歸三山序）這末貶儒生地位於娼妓不若，一方面由於儒生徒讀死書，不能生產，是無補國計民生的廢物；另一理由，則以儒生承先啓後，發揚「尊王攘夷」的民族精神，這是對於外族侵略者一種根本的反動，侵略者不能不予以精神上壓迫，直接予我中華民族思想以嚴厲的打擊。從根本上摧毀我們的民族思想，這種毒辣的政策更甚於放逐「南人」爲飢餓的奴婢。同時，州縣長官可以世襲，「奸臣恣睢於上，貪吏擠克於下」，宋餘子遺，民不聊生。軍官也保存封建的積習，將戰敗的俘虜，沒爲家奴；萬戶與遠魯花赤也都以傳之子孫，數傳之後，「執榜之童，握兵符，任折衝，將驕卒惰，不可復用」；時雖有「禁南人挾弓矢」的嚴令，盡括民間的武器，但是，不到百年，我們的民族英雄方國珍揭竿起義於黃巖（公元一三四八年），繼之而起者，有韓山童、郭子興、張士誠、徐壽輝等，一時豪傑騰起，爭殺疆子，大元帝國也就崩潰了。一三六八年七月，常遇春攻陷北平州，順帝使星夜逃出大都，向沙漠以北老家退走。

## (30)

以皇覺寺的一名僧和尚投到郭子興部下，當親兵，就憑藉這個力量，招兵買馬，延攬豪傑，擊敗陳友諒、張士誠，降服了方國珍，削平了閩粵，定鼎金陵，創立大明帝國。漢高祖以後，我們不能不承認明太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千古之雄！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一三六七年），太祖統一了江淮以南，將移師北伐時馳檄以告黃河流域的民衆說：

「自宋辭傾移，元主中國，此豈人力？實乃天授。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弑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禮義者，御世之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及其後嗣，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世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賊戰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雖爲我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友爲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爾民其體之。」

旌旗北指，不斷斷於種族的界限，但欲解除元朝的暴政以安百姓；這種弔民伐罪的態度，正是我們民族所最贊

美的革命美德。每次出師，太祖總是語戒將士，「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一反塞外馬隊屠城擄掠的軍紀；這更是我們農業社會所最歡迎的王師。大軍所至，不許破壞生產事業，所以徐達常遇春兩位大將軍長驅北伐，勢如破竹的取山東，收河南，先斷大元的屏蔽和羽翼，完全實現太祖的方略。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太祖在慰勞北伐大軍的時候問徐達收復燕京的計畫。達對以齊魯河洛既平，王保保逡巡太原，觀望不前，元軍的聲援已絕，取燕京孤城，易如探囊取物了。太祖按地圖指徐達道：「北土平曠，利騎戰，不可無備。宜選裨將，提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轉臨濟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如太祖的戰略，常遇春兵到通州，元順帝果然不戰而走。「北土平曠，利騎戰」，這句話，不但是取燕京的一時困難，也是我中華民族的千古問題，由慕容氏、拓跋氏，到契丹、女真，都是以優勢的騎兵雄據一隅，我們的步兵總是末如之何。太祖能够運用淮甯的步兵，恢復中華的統一；這個事業，比較唐太宗運用關中晉陽的步兵征服塞外馬隊尤其想難了！「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這個歷史原則，居然證明太祖首先打破了。現在，我們追尋他的成功緣因，除了宋儒提倡「尊王攘夷」潛在的思想力量之外，應該承認太祖的安民政策能够配合他的軍事天才。

(31)

太祖收復了燕京，即派常遇春李文忠窮追蒙古皇室，至於上都，改爲開平衛；又派徐達藍玉窮追蒙古大將王保保，至於土剌河，反大敗而回；蓋在沙漠地帶，蒙古馬隊又活動了，儘管明師窮追，總滅不了蒙古的主力。太祖知道沙漠終是大明帝國的威脅，便派大將駐在北平訓練軍隊，聽燕王棣節制。擊降了元太尉納哈出之後，便將兀良哈一帶地方分設朵顏、泰寧、肅餘三衛，以處蒙古的降人。又設大寧都司控制三衛，這種辦法是模仿漢朝以呼韓邪單于抵禦北匈奴，由積極的進攻而轉爲消極防禦了。誰知駐防北平的重兵被燕王用去靖難，

驅走了太孫建文，繼承了太祖的帝位。成祖皇帝不顧一切，又將國都遷到北京。北京距離沙漠更近了。成祖反將國防重鎮大寧都司徙到保定，而將三衛全權交給蒙古人管理，從此三衛成爲大明帝國的首賜。永樂八年（公元一四一〇年），成祖親征到斡難河，擒不着阿魯台，僅在擒孤山頭勒了一首「瀚海爲鏢，天山爲鐔，一掃風塵，永清沙漠」的歪詩，聊自解嘲。二十年（公元一四二二年）前後運用子三十四萬頭，車子十七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的民夫二十三萬五千多人，輸出三十七萬石糧食至塞外，以待皇帝親征。結果，阿魯台依然逃走，順便，大破兀良哈而歸。從三十幾萬驢子隊輸送軍糧看，有明一代屢征沙漠，始終不見成效的主因，就是因爲缺乏馬。自從宣宗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徙開平衛於獨石，龍岡灤河之險，自動放棄了。國家所賴以抵禦蒙古馬隊的，惟有長城。正統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土木之變，英宗被俘，蒙古馬隊還是破紫荆關而直驅北京，長城並不會限制侵略者的鐵蹄。而三衛降人更叛服不當，時向關內進擾。穆宗隆慶二年（公元一五六八年）朝廷派大將軍戚繼光專門訓練邊防軍。戚大將軍就指陳當時邊軍的弱點說：

「邊鎮之卒，壯者役於私門，老弱僅以充伍，有火器而不能用，棄土著而不練；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且不知兵法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教訓之法，實用則不美觀，美觀則不實用，今皆虛名耳，其實無有也。臣又聞薊北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塞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蒼鬱，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於車，在近邊利於騎，在邊外利於步，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迹浙江，思川浙人，願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更於西北招募馬軍五枝，步兵十枝，聽臣統練。方今朝議紛呶，易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使臣無掣肘虞。」

到了神宗萬曆年間，戚大將軍所計劃的各兵種訓練成熟，山海關獨石口一帶要塞，便獲得鐵的保障，漸無風塵之警了。從這個事實看，沙漠邱陵，雖然培養成功那一羣一羣的弓矢之民來破壞我們農業社會，我們民族能有

天才的軍事家「因地制宜」，——或利用天然的形勢，或剋服天然的障礙，也可以轉敗爲勝。換句話說，我們的國防線，一向是活的名將勝於死的長城！

中國政治權歸士大夫則治多亂少；權歸外戚宦官，一定是治少而亂多。因爲外戚宦官，都是皇帝私人，他們善於伺候皇帝的顏色，滿足他的私慾，一切行動，從外表看確實效忠皇帝，無微不至。可是皇帝的產業是國家，國家的治亂往往與皇帝私生活相反，——皇帝私生活越是滿足，國家的政治就會越紊亂；皇帝私生活越能克己，國家政治越能夠納於正軌，百姓生產力量也越能夠充份發展。在「朕即國家」時代，善於忠君的宦官外戚未必顧到皇帝最大的產業天下國家；善於管理天下國家的士大夫未必善於滿足皇帝的私生活。不客氣說：忠君者不一定是愛國；愛國者不一定能忠君；其能既忠君，又愛國者，便是古今名臣了。名臣必須遭逢聖主，聖主不世出，國家政權便旁落到外戚宦官手裏時候多。沈唐之衰，可爲例證。明太祖受了歷史的訓練，即位之後，便嚴禁宦官外戚干政。不幸，成祖的皇位由宦官內緜取來，從此國家政治不能不及其祖宗寶訓而假手於宦官；即太祖所一再聲明「將在外，君不御」的政策，成祖以後也不放手，相習成風由宦官監軍。以成大將軍的勤勞國事，做到薊北總兵，還要請皇帝派「監軍科道官」，其他的將領，在「監軍」掣肘之下，不能發揮其軍事天才而貽誤軍機殺身不足以報國的人更不知凡幾了。三保太監下西洋，儘管是「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數」，絲毫不能解除塞外的威脅。這個威脅，兩漢以來日加嚴重；大明帝國也終亡於塞外的馬蹄。

(32)

三衛之難未了，俺答的馬隊又寇犯京師；俺答之難未了，建州衛的女真徐裔努爾哈齊又以十三個甲士踐食鄰近的小部落逐漸強大起來。神宗萬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努爾哈齊併吞了尼堪外蘭部，向明朝進貢。萬曆十七年，朝廷命努爾哈齊爲建州衛都督僉事。他憑藉僉事的地位，收服松花江一帶的女真，征服嫩江以西



「遼左之境，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砲一策」。因爲關外名城都已不守，失了地形上的險要，人心便動搖；因爲人心動搖，縱有天險，也不能守；尤其是當時的軍隊，不會經過威靈光那樣山戰、谷戰、林戰的嚴格訓練，根本「不利野戰」。國家不能訓練野戰軍，取攻勢國防，但憑城守困敵，敵人能有援兵爲繼，堅城決不能久守，國防線決無不破之時。眼光放遠些看，如其死守國防線，不如訓練適應地形的精兵。熊廷弼與崇煥所以不免刑戮者，雖如崇煥所計：

「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粟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卽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一班不識時務，不習邊情的朝臣，好發不負責任的議論，攪亂邊將作戰計劃，誠然可恨！但從當時名臣黃道周請崇禎帝「訓練士卒，以固邊圉」，李如燾也奏言，「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可見熊袁諸公不能從根本上簡練精兵，適應地形，從事野戰，他們確有應得之罪。

最嚴重的問題，還是由於宦官魏忠賢把持國政，凡有利於國家而不利忠賢政權的言論，絕不許上達天聰。同時，有理智，有骨氣，一班忠君愛國之士，被魏附忠賢的徒黨排擠不足，加以殘害株連，所賴以維繫國家生命的忠義之氣，也讓他的徒黨摧殘淨盡。身負國防重責的熊廷弼與崇煥因爲不肯附和魏忠賢也先後被宦官陷害。這輩奸黨既然一手遮天，把握政權，當然是寶官鬻爵，潞頭汲的貪污。天不作美，西北各地連年的赤旱，飢民不勝官宦的敲剝，相率入山爲盜。從延安燃起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延燒到山西、河南、四川各省，而終至於不可收拾。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劉懋會上疏道破延安流賊的起因：

「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卽延慶之民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爲嚮導，土寇倚邊賊爲羽翼，六七年來，……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飢民也，而其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衆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金三錢。

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卽慈母不能保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爲盜乎？……」

盜賊之起，若非飢寒所迫，必由政治貪污激動，所以，自古以來，欲治國者必先安民；欲安民者必先嚴厲的懲治貪官污吏。惜當官亂政之後，崇禎帝專力經營邊防，無暇顧及內政，一任那察官吏「驅飢兵，勸飢民」，盜勢愈勦愈大。延至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三年）延安的飢民領袖李自成，居然闖進北京。崇禎帝在內憂外患煎迫之下，走頭無路，只得一死以謝天下。臨死，在所穿的藍袍上寫道：

「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這封慘絕人寰的絕命書，所說誤朕的諸臣，大概是指在朝的官吏，各自樹黨，互相攻訐，彼此黨氣用事，往往將錢尖大的事體，鬧成嚴重問題；反將軍國大事擱置一邊。因爲私黨的暗鬥，各用意氣，各走極端，把我們的國家鬧得天翻地覆，把我們的民族葬送在苦海血泊裏，兩漢以來，若黨錮，若清流，若元祐，若道學，……不知經過若干次，明末的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這班名流，也不能不負一部分亡國的責任。

### ( 33 )

吳三桂，真是我們民族的罪人！他統率邊防軍五十萬人，不急崇禎帝之難，不管父親吳襄的生死，一聽到姨太太陳圓圓被李闖王的部下劉宗敏擄去了，衝冠一怒開了山海關門請清兵進來援助他奪取愛妾；大明天下就讓大清皇帝搶去了！

清帝入關，雖然不會費力，後來不李自成、張獻忠，攻取南明和臺灣，却費了很大的精力。假使弘光帝不好聲色貨利，不爲馬士英阮大鍼所包圍；軍國大事一切交給史可法劉宗周左良玉調度，也許割河不能，割淮爲

界，造成南宋與金對立的局面。清攝政王多爾袞却不像遼金南寇的蠻幹，將清太宗在松山俘虜來的明經略洪承疇拿出來做「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以招撫江南各省；東南半壁，在這位「大櫛舉」（清太宗最早稱洪氏為經營中原的尊者）經略之下，或者鷄犬不驚，或者鷄犬不留，或者鷄犬不留，次第的鎮壓下來。只有臺灣，延至聖祖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纔被平定，中國重歸一統。

清初政治，大半採納洪承疇的建議，沿襲明朝之舊，行政中樞以內閣為主，一切題奏，下內閣擬旨，分下六科鈔寫，然後給各部各院施行。地方行政區域分設行省，處理各行省軍民事務的長官，如總督、巡撫、布政司之類，也都是沿襲明朝的舊制。自中樞至於地方的行政人員，不學元朝人以蒙古為主，漢人為輔，處處帶有歧視的種族性，而是滿漢參用。漢人可以積功入閣辦事，官至內閣大學士，滿洲人也可以降在漢人督撫下做知府知州。這樣，漢官如有背叛的跡象，滿人可以監視；滿人官吏有何貪墨不法的行為，漢人也可以顯奏天庭；在滿漢官吏互相砥礪之下，政治比較前朝清明得多。尤其明太祖所手訂禁止外戚宦官干政的法令，到了成祖時代便完全推翻了，有清一代，除了那拉后執政時代宦官稍微弄權之外；以前的皇帝，都能够實行明太祖的禁令；所以清代的政治，比較元明以前任何朝代都上軌道。自順治入關（公元一六四四年）至咸豐即位（公元一八一五年）二百多年之間，除了討伐明代餘裔和降將，或者戡定邊亂之外，在皇室，不會因弟兄爭位問題而大興干戈；在地方，也不會因為中樞過度的搜括軍費，官吏無限的充實官費，逼得民不聊生，挺而走險，而需要大兵去屠殺。我們民族在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帝清明的政治休養生息之下，全國人口日益累增，據皇朝文獻通考及劉錦藻續通考所統計的數字：

順治十八年（1661）人丁總計是：

2106,8609口

康熙二十四年（1685）

2341,1448口

康熙六十年（1721）

2735,5642口

疑當爲「一七三五五六四二」口，刊本脫了「一萬」二字。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乾隆十四年 (1749)	1,7949,5039 口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2,7755,4431 口
嘉慶元年 (1796)	2,7566,2044 口
嘉慶二十年 (1816)	3,2657,4895 口
道光元年 (1821)	3,5554,0258 口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4,1944,1365 口

史實告訴我們：兩漢之盛，全國戶口不過六千萬；大唐之盛，不過五千多萬，明成祖時代，也不過六千六百萬，而順治之初至道光末年，二百年間，全國人口膨脹了二十倍，即以此論，大清帝國之盛，比之漢唐，毫無愧色。我們回顧歷史，不能不承認漢唐以後，大清帝國也算是中華民族極盛時期。

況且，蒙古的餘裔，終明之世，崛起漠北，為中國禍，也為東北邊陲之禍。康熙皇帝三度親征喀爾喀，驅除喀爾丹於蒙疆之外，分其部落為三部，編為五十五旗，從此藉沙漠保護以威脅中國的強梁游牧者土地正式列於版圖。此時，元代的餘裔四衛拉特部猶崛起於西域，乾隆帝再派大軍遠征，直追到喀薩克。從此天山北路準噶爾喀薩克也正式列於版圖。此時，和卓木忽然在天山南路蠢動起來，勝殺國家的使臣，乾隆帝即派駐在伊犁的重兵，向南進討，不久，大小和卓木授首，回部也就完全裁定了。同治年間，回疆又亂，左宗棠討平之。光緒九年，併天山北路建為新疆省，自漢武帝開始經營的西域，經過了二千年的艱難，始完全列於郡縣。現在，我們決不能忘有滑一代賢君名臣的功烈。

有滑一代，經營邊疆以西藏的成功為最大。西藏就是屢寇大府的吐蕃，宋朝也沒奈何。元朝置烏斯藏，奉其高僧八斯巴為帝師，封他為「大寶法王」，現在蒙古文就是這位高僧造的。因此，蒙古人至今還是信奉喇嘛教。明代中期，西藏喇嘛教分為兩個教主；一個居拉薩，是為達賴喇嘛，兼掌政；一個居札什倫布城，是為班

禪喇嘛。在清朝開國之初，達賴先遣使進貢，順治入關以後，班禪也遣使入朝。康熙年間，準噶爾人賈喇薩，破壞法教，同時達賴班禪也互相攻擊，康熙帝便命皇子為大將軍，統率滿洲蒙古的綠營數萬人攻進西藏，恢復他們政教合一的政治，所謂「因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從此西藏人都慕義向化，臣服於清。蒙古人多半信奉西藏宗教，西藏既然歸順，蒙古人也從此世為大清不侵不叛之臣了。現在，雖然猶存於北平的雍和宮，就為統制蒙藏兩個邊區而設。統制邊疆，以武力擁護宗教的尊嚴，這是有清一代最大的成功。也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必需過程；因為構互在我們面前的山川與沙漠，用那種原始交通工具，既然克服不了天然的困難，也就無法破除「贊幣不達，言語不通」的種族間隔膜。清代頒邊政策，以宗教代替武力，即培養民衆的信仰以祛除地理的障礙，使我們民族問題，不再受地理的支配，康熙皇帝在我們民族全史的地位，似可媲美漢武帝唐太宗。他與帝俄訂立的尼布楚條約，也很值得我們歌頌的。

(34)

潛政之壞，壞在軍機大臣多以宗室為主，操縱一切。以那班統裕子弟專門研究聲色狗馬的技倆主持軍國大計，當然保守不住先皇的政績。軍事，則用以開國的八旗，用以承家的綠營，都腐化了，代之以鄉兵；鄉兵壞了，代之以湘軍淮軍；淮軍壞了，代之以小站練兵；所賴以維持政權的基本力量，漸移歸漢人掌握。到了清末，儘管是政在親王，權歸母后，實則北洋大臣李鴻章為當時的中心人物。李鴻章所以能造成他政治中心的位置，平太平天國和捻匪的功勳固不可泯；最重要的緣因，還由於他通洋務，能够應付國際問題。

從禹實九州起載，擴大為駟衍的大九州理論，漢初學者猶認為「闕大不經」。等到張騫通西域，甘英到條支，我國學者始漸發現以前的四海觀念過於狹隘了。成吉思汗的西征，三保太監的下西洋，纔確實擴大中國人的世界觀念。當時我們士大夫所敢自信而且自豪的，是：中國文化高出一切民族；中國武力強於任何國家。

決不料明嘉靖年間，菘爾三島的日本，可以焚掠江浙幾省，可以蹂躪朝鮮全境；更不料佛郎機、和蘭、意大利、亞梯山航海，由大西洋繞好望角而叩中國之門，入中國之室了。佛郎機的火砲，官兵領教過了；意大利的天算，比較大統曆精密得多，也被國家採納了。這支海上浮來的艦艦巨艦，挾其進步的科學智識與其革命後的工業技術，一天天的緊逼而來，當時士大夫却不曾自做自揚，還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而藐視一切的民族文化。清初楊光先著一部不得已專門攻擊西洋宗教和學術，可以代表在野士大夫的見解。試看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三年）賜英吉利王敕書云：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齋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肅摯，具見爾國王恭順之忱，深所嘉許！……所請派人留京一事，於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於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賁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艾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這種口氣，儼然的我為上國，英為藩臣，猶不失康熙帝以俄羅斯為外藩的威風。會幾何時，大英帝國的艦隊為了販賣鴉片問題，由印度東來，攻陷浙江定海，又回師攻破虎門要塞，直薄廣州，再北上犯長江，連陷乍浦、寶山、上海、鎮江，大小八十餘隻英兵艦列隊在南京草鞋峽江面，國家有點慌了。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便在南京簽訂了萬年和約。條約簽訂了，朝廷又翻悔，引起英法聯軍襲擊廣州，活捉總督葉名琛，又北上攻陷大沽。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由俄國從中斡旋，重訂天津條約：「欽差大員及眷屬，可在京師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與中國平等；覲見，有礙國體之禮（指跪拜叩頭），是不可行。」這時，皇帝命令便臣諛延龔說：「此時俄國既肯從中說合，亦須在中國面上下得去，方能兩全，若偏聽英佛一而之詞，於中國不便。」顧不了一「天朝體制」，只要求「面子下得去」，大清帝國的威望一落千丈了！接下來，法國海軍，在光緒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佔領東京，硬將我二千年的外藩安南，強佔去為法國的保護國；光緒二十年（公元一

八九四年）日本大敗我師於東北，割去了臺灣與朝鮮；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明年又與德、奧、日、比、英、美、俄、法、義、日本，和關十一國訂立有名的辛丑和條，海上的颶風，一陣一陣的向大陸襲擊，大清帝國的氣焰，便一天一天的向下萎縮，由驕傲而轉為乞憐。總而言之：十九世紀後半期，我中華民族成爲釜中之魚，俎上之肉，聽人家宰割；宰割我們的主力，不是西北沙漠而是東南海洋。

(35)

海洋，在我國過去的文藝作品裏，不大發達，像李好古張生賣海曲云：

「黑淵漫水容，滄海寬高，崑崙山勢，崑崙大明，滴溜冰輪出海角，光燦綉紅日轉山崖。這日月往來，只山海依然在。彌八方，徧九垓，開崑崙河漢江淮。是水呵！都歸大海。

你看那，十三洲三島微茫處，閩苑蓬萊。望黃河一股兒渾流派，高冲九霄，遠映三台，上連銀漢，下接黃埃，勢汪洋，無岸無涯，出許多異寶奇哉！……」

立在海灘上望着滄波一片，發出一點神仙幻想，倒不如晉木華海賦的「爾其爲狀也，則乃激湍激瀾，浮天無岸，澎湃沆瀣，渺瀰漫漫，波如連山，乍乍乍散，噴噴百川，洗滌滄溟，襄陵廣島，鄒濤浩汗」，寫得深刻。然而海的偉大，不在其波濤洶湧，漫無涯涘；而在他豐富的物產，變化無常的氣象，都會直接影響到人類的生活。由於海的文藝作品不多，適足證明我們民族對於海洋智識的貧乏，彷彿對沙漠一樣的隔膜，所以國人以航海爲畏途，有「望洋興歎」的妙喻。以朝氣蓬勃的蒙古帝國，創爲海運，最初認爲有利，後來不勝風濤之險，物資損失，就罷海運，代以運河，更可證明國家對於海洋也具有恐懼的心理；所以有史以來，我們民族不易練成強大的海軍。元世祖征日本，十萬大兵片甲不回，雖然因爲颶風海嘯，何嘗不出國人缺乏海洋的智識和訓練！明朝，對於海洋，似已有所警戒，濱海要地，設立衛所五六十個城，如，山東的威海衛、靖海衛，浙江的

金山衛、定海衛，都是用以防禦倭寇的，而倭夷依然的到處寇掠。賴成繼光俞大猷諸將神勇，費了十餘年的時間，在陸上殲滅倭寇的主力，繼將他們逐回三島。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在英日同盟的互助下，日本勃然的興起來，挾其海洋的基本力量，又向大陸進逼。以遼東半島為基地的「南滿株式會社」，初步擴大為「滿洲會社」，再擴大為「滿蒙會社」，最後擴大為「大東亞共榮圈」，宛如投石水中，浪圈兒一層層的推進，由「偽滿洲國」，到華北五省特權，得尺進丈的向山海關內侵略。同時，又從海上捲起一陣狂浪，逆着長江的潮流向西倒灌；轉瞬之間，我中華民族要被逼陣驚濤駭浪捲入無底深淵了。民國成立以來，我們民族無日不在日本軍閥拳打腳踢，槍刺毒霧之中過着次殖民地者生活。民國二十六年又揮其倭刀由東北直向我們頸頸子研來，舞其長劍，由海上直向我們心臟刺來，運用其多年侵略的蓄積與其海陸空軍比較進步的技術，如封家長蛇，吞噬我們的沿海沿江各省，——燒、殺、淫、擄，凡野蠻人所有的殘暴行為，日本軍閥優為之；凡二十世紀所有的科學新罪惡，日本軍閥也無不盡其效能以屠殺我國的民衆。松井石根攻佔南京之日，縱其將士用機槍掃射成千成萬已經放下武器的士兵，還不能滿足他們的獸性；更用指揮刀作殺人的競賽。總而言之：日本軍閥慘酷的屠殺，他的技術，集了古今中外之大成；我中華民族所遭受東洋海寇的災難，也集了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奇慘！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現在自我檢討如此慘敗的緣因，不外：

(一) 自來國家政治，「有治人，無治法」。一般官吏皆「以文亂法」的「成則爭功，敗則誣過」，敷衍公事，以誤國家的庶政。法制，失其尊嚴了，一般士大夫專在人事上做功夫。甲午之敗（即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戰），敗在那拉后與光緒帝爭政，翁同龢站在光緒維新的立場，明知國家不可戰，想利用戰敗機會，罷免那拉后的寵臣李鴻章而還政於光緒。在合肥系（李氏）與常熟系（翁氏）爭權之下，自然形成一種人事系統。這個系統，一脈相承到袁世凱帝制，段祺瑞執政，而北洋軍閥的混戰，大家從事「人事」鬥爭而不問「國事」成敗。「國事」隨着「人事」轉移，朝令夕改，昨是今非，政治失其中心，法令成爲

具文，直至國民黨北伐成功，還掃除不滑「人事」為重的積習。一旦人事的系統完成，大家為患得患失的心理所籠罩，相率而圖各個勢力的發展，各個政權的永固，遂養成一種事事有人把持，而國家感與應革的大政，反形缺乏可以担当的人材。換言之：善於勾心鬥角奔走人事者，未必再有餘力漸養新知以謀國事。人事成於朝，國事敗於野；歐美政治一日千里的前進，我們政治則如蝸牛競走，跬步不前，相形之下，愈見落伍了。

(二) 以言生產，歐美自工業革命後，由汽力電力，上窮碧落下黃泉以求新的動力，新的物資，努力改善國家的生產。我們呢，一切新的機械不能製造，全靠外人供給一點新的工具，增加生產，維持交通。國家的交通，大部分還靠土製的手車、驢車和帆船來繫聯，生產則完全停頓在國藥時代，大部分以人力為主，獸力為輔，保守唐宋以前老法子。手搖的紡紗機織布機被機器壓碎了，就用洋紗，穿洋布；土壤不加研究，種子不改良，所收穫的稻麥不足餵國人之口時，就吃洋米洋麥苟延生命。我們「以農立國」，農人食不飽，穿不暖；而一般不事生產的大腹賈，反錦衣玉食，騰達飛黃。於是，生產者血汗集中到大都會，大都會的商人就以這批血汗貿易海外的高尙享受，縱情娛樂。只圖個人貿易的發達，不管國家生產力衰減；只圖眼前的都市繁榮，不管農村破產的悲哀。我們國家的生產主力——人和獸，在飢寒交迫下連性命都不保，何從迫趕汽力電力呵！

(三) 從知識水準看，人家的國民教育，普遍的提高到中學程度，我們的小學教育，除了一般都市辦得像樣外，鄉村的學校，多數是寄居在祠堂古廟裏，無設備可言。負教養之責者，也以地方紳士為多。紳不紳，學不學，烏煙瘴氣，已經够醜了！窮鄉僻壤，有時求一所烏煙瘴氣的小學而不可得，所謂普及教育的成績如是，國民知識的水準何從提高到現代程度？所賴以培養專門人材的高等教育，應該為學術而學術，努力實現國父「把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的實訓。可是，一部分教授總忘不了「學優則仕」的傳統思想，

始則一邊講學，一邊談政治，繼則專門政治活動，而逃入實驗室，拋開書本子，甘心做「政客學者」。也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會進過實驗室、圖書館，但憑他的頭銜和三寸不爛之舌，以教授為跳板，跳上政治舞台，便躊躇滿志者，也歡喜到大學去。大學，在一羣「政客學者」和「學者政客」活動之下，當然學術空氣遠不如政治意味的濃厚。多數學者，受了政治刺激，有的不甘寂寞，同流合污去了；不願隨聲附和的人，在政客學者羣嫉妬的心理下，受其宰制，也不允許有計畫的研究。不進則退，我們各大學裏至今不見鶴髮童顏的老教授；年青有為的教授，稍有成就，便思從政，從政者成功，而忠實於學問者往往不勝政客的摧殘，不能有所表現。我們大學教育多數是有名無實，我們全面的學術思想比較歐美，落伍的程度豈不可以道里計了。

現代國家完全建立在學理上，我們學術不競，當然的工業落後，生產落後，以至政治經濟無往而不落後。這次抗戰，所以抵禦日本雷霆萬鈞之力者，不能不歸功於我們民族領袖蔣主席的大無畏精神，與卓越的毅力。他老人家在廬山登高一呼，我們的壯丁便放下犁鋤踴躍從軍；我們的老師便接上犁鋤，供給糧餉；我們的將士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堅甲利兵相搏；我們的工廠也竭其綿薄以補充軍需。因為工業落後，不但新式武器不能自給，即便得到一點新武器，我們來自田間的士兵也因為毫無機器知識，要訓練機械化師團還是加倍的困難。敵人以工業生產來攻擊，我以農業生產去應戰；總而貫之，一部長期抗戰史，是用農民的血淚寫成的，我們農村的主要動力，至今不離牛馬；那末，這次抗戰，也可以說：我們領袖，但憑藉牛力馬力，硬與敵人的汽力電力相掙扎。雖然，偉大的領袖，以其至大至剛之氣，運用牛馬擊敗了機器；運用農業擊敗了工業，運用國家四部傑山峻嶺，壓平了東海上吞天鉅浪，造成中華民族史上千古未有的奇蹟！可是，環顧四周，我們民族的危機，並未末減。

東南的海洋，第一次颶風狂浪過去了，將來會不會另起一陣更狂暴的颶風向大陸襲擊，直淹沒了喜馬拉雅最高峯，將中華民族整個沈下去，我不是天文學者不敢憑空預測。然而，秦漢以來，我們民族的重大壓力，是自西北起，慢慢的延至東北。匈奴衰而蠕蠕起，蠕蠕滅而突厥興，突厥之後又有回紇、薛延陀、黠戛斯，至成吉思汗崛起，乃一統而為蒙古帝國。這些脚色，都是夏則避溫北還，冬則避寒南牧，一旦我們國家衰弱，便飽嘗他們的鐵蹄，直至清帝座臨，三次親征，然後因其政治，撫以宗教，纔將這塊荒寒之地完全克服。現在，外蒙古，在鄰國提攜民族自覺的口號下，脫離中華民族而另組「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首腦人物，如其回念或吉思汗以來與中華五為宗主的關係，當然會親如手足，存亡相共，永遠結為兄弟之邦，共謀東亞的和平。如果他們僑於西北的寒威，從風而靡，那末，萬里長城將不能阻限他們，在秋高馬肥的時候，又向黃河流域開闢牧場了！

烏桓衰而鮮卑盛，拓跋氏，宇文氏，相繼主宰華北。唐之衰也，韃靼奄有東北全土，契丹、女真，又相繼開闢中原；待蒙古興而八紘一宇，夷夏大同，開世界未有之新局。明亡滑纒，也造成漢唐以後文治武功無與倫比的盛業；是皆東胡族也。梁任公先生有言：

「綜觀二千年史蹟，外族與我族之關係，以東胡為最頻繁，其苦我也最劇，其同化我也最完。前有鮮卑，後有女真，皆數度入主中原，且享祚較永；殆彼我民族性較接近，易相了解，不期而若螟蛉之有果蠶也。由今觀之：過去侵暴，已成陳迹，全部變為中華民族之成分，吾儕但感覺吾族擴大之足為慶幸云爾。」（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

梁先生大著，殺青於民國十一年雙十節，那時，外蒙在「五族共和」旗幟之下，仍為中華民國主人的一份

子；東北尚未發生「九一八」事變，所以他有「足爲慶幸」之感！現在，外蒙已自我們大家庭分離而獨立門戶了！雖傾全國的力量，歷時十五年的長期抗戰，自侵略者手中奪回了東九省，可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另是一支新發於爾的爾鐵蹄穿透東九省的心臟，在我們國土上開闢了向太平洋上侵略的大門。同時，積我們聖君賢臣將近二千年的經營之新贛省，在侵略者利劍的指麾之下，也漸見搖搖欲墜的分裂。從西北到東北，侵略者的魔掌套上潔白的主義手套，不斷向我們國土攫奪；而國內所自翊爲前進階級爲那潔白的手套所陶醉，翻而歌頌那隻侵略者的魔掌，民族危機，現在還許人們提示，將來的恐怖，也許不容人呻吟罷！世界必然要統一的。統一的基礎，應該由民族平等，民生平等，民權平等做起；暴力的侵略，徒促成第三次人類的大屠殺。東北西北，都是中華民族的生命線，而今尚未逃出恐怖的侵略，何慶幸之足云！

## (37)

至於暹羅、緬甸諸部問題，歷史上雖或興盛過，而北寇我國西南諸省，尋即敗回本地，雖曾促進大唐帝國的覆滅，但於中華民族的存亡則鮮直接的威脅，故本文未加論列。本文所論，範圍雖狹；而其要點，可爲中敘者：

(一)我國外患，鴉片戰爭以前，常在沙漠；以後，轉到海洋。海洋浮來鯨鯨鐵艦，鐵艦載着精洪的科學打倒我們的玄學；載着神祕的機器打倒我們的手工業；不但是堅甲利兵粉碎了我們的連弩金城。沙漠爲游牧者根據地，他們馬上爲家，左顧右射，驍悍好戰，習慣成自然。我們農業國家，鋤耨棘矜，不敵「弓筋之民」；一元大武，不敵鐵騎如雲，故秦漢以來，我們農民疊遺漠北游牧者踐阻而莫之能禦。

(二)秦始皇爲子孫萬世打算，築萬里長城以禦胡騎，胡騎依然叩關內犯，屢寇中原。中原所能驅除胡騎於漠北者，必先統一國家的政令，然後萬衆一心，軍民同體，以騎射還騎射，以游擊還游擊，越武獵

王、漢武帝、隋文帝，皆以馬禦馬者也。唐太宗獨能用步卒五千殲敵騎十倍之衆，非常之功，未易重見；故太宗以後，北征的主力還是非馬不行。明成祖以驍子隊追韃靼，即無功績可言。綜觀二千餘年歷史：馬盛則國盛，馬少則國危，我們的國運也以馬爲候，不獨漢北游牧者而已也。

(三) 民族之盛也，我們的步騎可以飛渡游牧者的天然保護線——沙漠，鞏庭掃穴，責以不庭；其喪也，雖有固若金湯的長城國防線，也不能阻止胡馬，背塞南牧。不幸，我中華民族盛時少而衰時多，長城以內，沃野萬里，常在胡騎鐵蹄之下，刈夷焚掠，民不聊生。三國而外，前如五胡十六國，後如五代十國，稱王稱帝，雄據中原者，大半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凡由種類問題造成國家的分裂，荆淮荆江，總是受了地理支配，「南船」不易征服「北馬」，「北馬」也不易直渡天塹，征服「南船」。符堅兵臨肥水，佛狸元尤飲馬長江，皆慘敗而回，非天相中國，實地陷胡騎也。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又不如人和，隋滅陳叔寶，宋滅南唐，元滅南宋，總由於內政不修，軍令不肅；雖有天塹，無救滅亡之難；此之謂長城不如天塹，天塹不如精兵名將，精神國防線堅於萬里長城。

(四) 歷史的昭示，中華民族，分則兵連禍結，等於長期自殺；合則東征西討，無往不利。秦皇、漢武、隋文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清聖祖，所以能威加四海，無遠不服者，全由國家一統，人力集中也。現在，國內的科學落後，生產落後，而鄰國秣馬厲兵，磨刀霍霍；雖竭我農工的血汗，牛馬的動力，萬衆一心以禦外侮，猶恐累卵之遭鐵石，一碰即碎。遼、金、元、清，殷鑒不遠；我們民族，決不允許河北三鎮，由割據而陷於敵國；更不允許石敬瑭劉豫之流，假鄰國的屠刀，刺我中華民族之肉。若有中行說吳三桂之類，或教匈奴寇漢，或引清兵入關，甘爲敵國的鷹犬以傾覆「祖國」爲快，他們縱然能犧牲「祖國」博得一時的富貴，可是名標青史，永是「叛逆」，秦檜的子孫也永遠不齒於中華民族之口。

(五) 在我民族的偉大領袖領導下，長期抗戰，幸已掃除百年來的國家積垢，而收復若干失地了。可

是，千餘年來，亡國屠城之慘，都發源於東北；而東北的現勢，不減於唐之契丹，明之三衛，箭鏃在胸，利刃在頸，星星之火，隨時可自華北而延燒至於江南。史實告訴我們，牛馬之力不勝汽力電力的攻擊，朝野上下，若不管大禍臨頭，退依賴廣土衆民躲在牛角尖裏從事一黨一系的蠻觸之戰，而不肯和衷共濟，積極的研究新科學以開發海洋，建設重工業以征服沙漠；卻保守牛馬之力，應付未來的原子戰爭，吾恐中華民族縱然倖免於海洋的陸沈，終必爲漠朔捲來的風沙所葬。

總而言之：冀之北土，馬所生也，二千年來，最多與國。那些與國，都是憑藉沙漠的保護，蕃殖他們的弓矢之民，鍛鍊他們的驃騉馬隊，以侵略世界，以蹂躪中國。中國文化，受漠北鐵騎的摧殘，前前後後，不知若干次了！每次鐵騎踏入中原，我們民族被迫而成五馬南奔，必遭無辜的全面殘殺，前如五胡亂華時民間口誦避諱「胡」字，後如清帝入關一切文獻避諱「夷」字，沒有我們民族自己建立的政權，便不能保護全民的生命。魏道武帝飲馬長江，可濟河淮以南被殺得千里不見人煙，春燕歸來，巢於樹上。元世祖滅南宋，號稱不妄戮一人；而常州全城被屠；宋之牙遺，成羣的被放逐到漠北當奴隸。沙漠所孕育的馬隊，給我們中華民族很多次嚴重打擊了！英儒菲格理甫 (James Faigrieves) 所著地理與世界霸權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曾說橫在新亞蒙古的大戈壁保護了中國悠遠的文化。山邊近沙漠區域發現大量的舊石器、新石器，和漢晉的簡牘，新亞也會發現唐人寫經和壁畫觀之，他的結論可以成理。若以中華民族全史看，則產生於沙漠的馬隊，每次背寒南牧，必予中國文化以強烈的殘毀。沙漠，正是中華民族的首腦！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地理與中華民族之盛衰

定價國幣二元三角

著者 丁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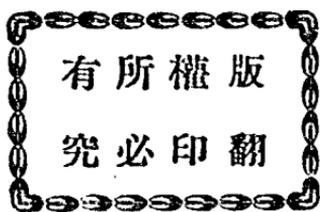
出版者 大中國圖書局

發行人 顧 剛

總發行所

上海(○)四川北路八號  
大中國圖書局  
電話四一八六五  
電報掛號五九〇六九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16

102022



\$